

REMEMBRANCE

記憶

DOMESTIC EDITION

国内版

Aperiodic Publication

不定期出刊

追忆似水年华
汇聚天下文章
建立交流平台



《记忆》328 期

【思想文化】

西方左翼知识分子与“乌托邦”/延 曦

——《红潮小史》启示录之四

【百年国史】

“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上）/金光耀 张 宁

——江西省接受上海知青的考察

【评论】

“状告海关案”跟进报道（69）

——纵恶即是作恶/李南央（美）

百万英镑与北戴河/张保和（美）

知识青年的榜样邢燕子/唐 燕

【序跋】

顶风冒雪呼唤春天 /于向真

——《寒空中的小星星》自序与后记

拒绝谎言，反抗逼迫/何与怀（澳洲）

——刘海鸥《画说我的一生》序一

【书讯】

于向真散文集《寒空中的小星星》在美出版

【述往】

我所参加的文化大革命（二）/ 杜钧福

一位省人大代表的自述——根治西淝水患（下）/张树田

【资料】

北京大学社教运动资料选登（3）

陆平同志在北大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上的讲话（1965 年 9 月 4 日）

【本刊声明】

【思想文化】

西方左翼知识分子与“乌托邦”

——《红潮小史》启示录之四

延 曦

所谓“红潮”者，指的是以马列主义指导下的，发生在各国的革命。包括苏联、美国、越南、马来西亚、古巴、秘鲁及非洲诸国。说的是绝大话题，可是作者不摆架子，娓娓道来，时不时还会幽你一默，让你会心一笑。作者自谦：“不是严格考证或者缜密分析”，“而是零零碎碎和人的经历有关的故事和细节”。“好”就好在这些“细节”，只有细节，才让历史显得真实与鲜活。

在世界共运勃兴的年代，西方有一大批知识分子以信仰社会主义为时尚，他们当中一些人往往有两幅面孔，让人难辨真伪。

上文说到的那个杜伦迪，在他对苏联制度百般奉承的背后，是他对这个国家的人民的极端蔑视。在公开报道中他用“要做馅饼就要打破鸡蛋”来为斯大林政权给苏联人民带来的灾难辩护。在背后他说得更露骨：上千万饿死的俄国人根本算不了什么，因为他们“都是俄国人”。

《红潮小史》作者讽刺说：“杜伦迪的这种态度在亲苏人士中其实是很有代表性的，很多人生活在西方，享受着自由民主和安全舒适的生活，他们并不愿意拿西方文明去冒险，搞什么社会试验，却希望看到其他一些地方把坛坛罐罐都打烂，重起炉灶，看看能搞出什么名堂。如果失败了也不要紧，因为他们本来就是穷光蛋，命里注定就要受罪。此外，这些地方的人都习惯了专制统治，在斯大林下面再熬几十年又算得了什么，何况——不妨假设——这种专制是为了达到一个高尚的目的。”

还有一些左翼大知识分子，他们访苏后的表现看上去很真诚。

作者在《萧伯纳漫游红色奇境》一文中给读者讲述了那个大名鼎鼎的萧伯纳访苏的故事。

萧伯纳自19世纪80年代开始就迷上了马克思，一直相信国家计划必然会取

代自由竞争，只不过他信奉费边主义，觉得在英国这样文明的国家应该采取渐进的方式。1921 年他将自己一本新出版的书寄赠列宁，在赠言中说列宁在西方受到的攻击就像华盛顿当年受到英国人和保皇党人谩骂一样。凡是苏俄做的事他都觉得有理。列宁用新经济政策取代军事共产主义制度后，他觉得是吸取了费边主义的精髓，而当斯大林 1928 年宣布实行五年计划、停止新经济政策后，他又觉得列宁不但是后继有人，而且斯大林是青出于蓝了。

萧伯纳早就向往着能有机会去苏俄看看，去苏俄那年他已经 75 岁了。他见到了斯大林，和他一起进餐，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说斯大林“身上汇集了教皇和元帅的奇妙之处”。

但萧伯纳的兴致在参观纪念反抗沙皇斗争的博物馆时受到了破坏。他看了那些介绍农民起义和激进青年暗杀沙皇的材料后对接待人员生气地说：“你们疯了吗？革命变成政府了，可你们还在宣传叛乱！你们是想让苏维埃政权被推翻吗？你们这样做等于是告诉青年暗杀斯大林可以名垂千古，这难道是明智的吗？把这些危险的垃圾都清除掉，这儿应该是一个法律和秩序博物馆！”

萧伯纳这种夸张的表演是他所擅长的挖苦和讽刺的另一种表现吗？这种可能不是一点没有。例如，当他被带到莫斯科赛马场参观时，他故作严肃地对苏联也有赛马表示惊异，然后说比赛时场地上大概只有一匹马吧。苏联人起先困惑不解，片刻过后，当领会了这个政治幽默时，他们自己也憋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萧伯纳不是傻瓜，不是不清楚这个可以尽情赞美的制度，绝不是一个可以在其中生活的制度。你可以在一个实验室里表达你的惊异和钦佩，甚至说这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地方，但你决不会动住在这个实验室里的脑筋。

况且，萧翁虽然是个社会主义者，但他却对自己的钱袋比谁都关心，常常为自己的书要百分之二十以上的版税，戏剧演出则要百分之十五以上的票房收入。每年他在美国的戏剧版税收入就有 8 万英镑，在今天这笔钱值数百万美元。最有意思的是，萧翁欣赏计划经济，但他对自己书稿的出版经纪人的要求只有一条：“我所要的是一个在书籍出版方面有经营才能的赌徒，当我们为我最新的书稿在市场上冒险时，他能给我最大的利润。”

检验萧伯纳的苏联之行，究竟是真心赞美的成分多还是夸张表演的成分多？

当然，西方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如作家罗曼·罗兰，作家纪德，他们都去苏

联访问过，之后分别都写有日记一类文字，他们的说法很不一样。

在莫斯科，罗兰会见了众多的苏联知识分子——作家、建筑师、音乐家、工程师；除了语言障碍因素外，罗兰敏锐地感觉到谈话不是推心置腹的，他们很多想说的东西不愿或不能倾吐出来。连给他诊病的医生都是紧张兮兮的。罗兰甚至怀疑（并没有明说）高尔基都受到了监控：高尔基的秘书克留奇科夫掌控了高尔基的全部日常生活。

在莫斯科期间，罗兰经常被邀请观看苏联电影和戏剧。罗兰不禁几次用到“拙劣”一词，认为要么是“政治宣传品”，要么是对美国歌舞剧的“拙劣模仿”。罗兰不无调笑地在《日记》中写道：“自从取消文艺形式多样化后，人民的艺术趣味败坏成这个样子。”

莫斯科增添了大量新的建筑物，克里姆林宫红墙漆成了白色。“莫斯科正在变成为平庸的欧洲城市之一，”罗兰在日记这样写道，“我没有感觉到它有什么特别的魅力。”“特权阶级没有钱，但他们有权，有权就可以弄到房子和食品”，罗兰在日记后的《附记》中流露出他对此的担忧，因为这与人民的生活存在着惊人的差距，是一种严重脱离人民的危险倾向。

一次群众庆祝游行给罗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他对群众表现出来的狂热的“领袖崇拜”表示不理解，但他又认为人民在集体游行中所表现出来的情绪是真诚的。

当局称已取消书信检查制度，甚至白党的信件也可能自由来往。但事实上，罗兰和朋友的信件暗中受到苏联的检查，因为信件收到时已被拆开，

罗兰发现在莫斯科附近的集中营关押着 20 万人。其实罗兰很明白在集中营中关押的并不全是像苏联秘密警察头子亚戈达所说的那样都是刑事犯，也有无辜者。

罗兰是应高尔基的邀请而来苏联访问的，高尔基别墅是罗兰苏联访问的主要落脚点。表面上看高尔基过着富裕的生活，但罗兰却感觉到了他的老朋友内心中不为人见的痛苦挣扎。高尔基的生活受到了权力上层的支配，违背自己的性格和良知成为政治工具。高尔基总是被光环和人群包围着，罗兰动情地写道：“我觉得，如果我和他单独在一起（并且消除了语言障碍），他会抱着我，长久地默默大哭。”

1944年12月30日，在巴黎刚刚解放不久的日子，罗曼·罗兰安然逝世。

罗兰死得适逢其时，不然如果让罗兰活着看到蜕变成沙文社会帝国主义的苏联，老人会做何感想？

罗兰担心《日记》为苏联敌人所利用来攻击苏联，于是在《日记》原稿的标题页上写道：“未经我特别允许，在1935年10月1日起的50年期限满期之前，不能发表这个本子”

50年后，我们才得以一睹这本日记的庐山真面目。

安德烈·纪德是法国著名作家，194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曾经是苏联事业的同情者，后来加入了共产主义阵营。1936年受苏联政府邀请访问苏联，受到了盛大欢迎。

纪德在俄国看到的是对于所有观念与想法的压制，以及严格的同化一致。比如说，他在一家工厂看到的“墙报”上压根没提到西班牙内战，而这仅仅只是因为《真理报》还没有表明共产党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没人敢在知道该讲些什么前冒险”。纪德没有找到无产阶级专政：“专政，没错，这里显然采取的是专政制度——但这是一个人的专政独裁，而不是联合起来的工人的专政，也不是苏联人的专政。”而且，这里到处都是对斯大林的东方式阿谀奉承。即使在电报中，即使是尊贵的法国来访者，也不能用“您”来称呼斯大林，而必须用“您，工人的领袖”或“您，人民的主人”。他曾想在斯大林生日时给斯大林发一封礼节性的贺电，因为前边没有加上那些歌颂词语，电报局竟然不给发！看个人崇拜达到了什么程度！

“现在他们想要的是服从和盲从因袭，”纪德写道：“哪怕是最细微的抗议、最温和的批评也会招致最严厉的处罚——事实上，这一处罚就是被即刻扼杀。我简直怀疑世上还有没有哪个国家比这里更没有思想自由、更需要卑躬屈膝、更可怕（实施恐怖统治）、更把民众当奴仆，即使是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也不曾如此。”

（译注，纪德访苏正值希特勒第一次连任，战争、种族灭绝、所有军人宣誓效忠元首等等尚未发生。）

在苏联，纪德看到了令他最憎恨的东西：“一切降低人的价值的东西，一切减退人的智慧，信念，和锐气的东西”。纪德说道：“我的作用就是揭穿谎言，我拥抱的是真理，假如党离开真理，我当即就离开党。”他又说：“在我的心目中，

还有比我本人更重要，比苏联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人类，这就是人类的命运，人类的文化”。“我认为真诚之所以重要，正因为事关大多数人和我本人的信仰”。

因为理想与实际差距太大，他觉得自己陷入了“乌托邦”式的空想之中，访苏归来后，纪德不再是共产党人了。

上世纪20年代末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令许多西方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苏联，他们想在那里看到地上天国，找到人类的希望。但是，一切都落空了。

对那些西方的大知识分子，无论他们的信仰真诚与否，我想引述的一句话是：30岁以前，不信社会主义是没心肝；30岁以后，还信社会主义是没头脑。

我们没有资格嘲笑前人，无论他们曾经抱有什么政治态度，只要他们不为屠夫唱颂歌，他们就还有为人的起码资格，而且至少他们曾为寻找人类社会的更好前景而努力过。特别是时下正值西方多事之秋，暴露出诸多问题，如果能够正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为人类前景忧心，就是有良知的人。

记起刘伯承元帅的一个故事。

刘伯承元帅身经百战，也是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的大功臣，但建国后的刘帅却不愿看战争影片。晚年赋闲在家的刘帅一见电视屏幕上出现战争场景，就会关掉电视或更换频道。他多次感慨道：“我们牺牲一位战士，他的全家都要悲伤，这给那个家庭带来多大的损失！同样，一个国民党士兵死了，也会殃及整个家庭。他们都是农民的子弟，一场战争要损伤多少家庭啊！就是因为这个，每在战前我们连觉都睡不好。现在战争结束了，我就不愿看、怕看战争的场面……我至今仍看到无数同胞为我们铺设的一条血肉模糊的路，我们是踏着他们的尸体走向胜利的。敌人也一样，他们也是我们的同胞啊！”

刘帅的子女曾问父亲：“淮海战役打得那么漂亮，怎么从未听您在我们面前提起过呢？”刘帅不堪回首地说，那场战役结束后，他梦见千百万年轻寡妇找他要丈夫，无数白发老人找他要孩子，他心里不安，所以根本不愿去想、更不会去谈起那场战役了。

人类为了寻找美好未来，牺牲了无数的生命。可是找到了吗？很遗憾。但是无论多么艰难，我们也不会停止寻找。这可能就是人类的宿命。既然是还没找到，那就不要自信地宣称哪一条路是历史之必然，至少不要再把战争诗化为“新世界的礼炮”！

【百年国史】

“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上）**——江西省接受上海知青的考察**金光耀 张宁¹

内容摘要：现有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主要是从知青视角出发的，本文则借助近年来所搜集的档案资料，通过知青接受省份的地方政府、农村干部和农民的视角来审视这一运动。江西省在上山下乡运动中一共接纳10万多插队落户的上海知青，各级政府将此作为政治任务来贯彻执行，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传和政治动员。而在具体落实过程中，出现了机构设置不健全、安置经费不落实、知青同工不同酬及知青受迫害等具有全国普遍性的问题。基层干部和农民因知青下乡影响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产生种种担忧与顾虑，尤以工分问题最为显著，但面对裹着各种口号的政治任务，他们有一套自己的应对方法。本文依据档案、知青日记和口述访谈等史料，通过江西省接受上海知青的具体事例，讨论毛泽东时代政治动员和高层政策如何在农村层层往下落实的机理，以及农民对国家政策的应对和他们与知青的关系。

关键词：江西省，上海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农民

1968年11月20日，王宗仁等61名中学生经过一天一夜的行程从上海来到江西省新干县云庄大队插队落户。“大队全体贫下中农倾村而出”，到三里之外汽车路的尽头来接这批上海学生。在热烈欢迎过去之后，大队干部和农民都将上海来的学生看作“犯错误的小牛鬼蛇神”，他们跟之前来的下放干部一样，是在城里犯了错误之后被分配到山沟来受苦的。尽管王宗仁他们反复说明“我们不是小牛鬼蛇神，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是上山下乡干一辈子革命的青年”，但大队老支书还是根据接待下放干部的经验来看待这些大城市来的青年学生。直到一个月后的12月21日，毛泽东有关“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新指示传来，“小牛鬼蛇

¹ 金光耀，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jinguangyao@fudan.edu.cn；张宁，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17110140020@fudan.edu.cn。

神”的说法才销声匿迹，王宗仁他们有了一个正式的新称呼“知识青年”。但知青们刚刚觉得扬眉吐气，老支书就对他们说：“毛主席让你们来，毛主席也会叫你们回去的！你们在这儿待不长！”²

发生在云庄村的这种情况是整个江西省农村干部与农民接受上海知青及对上山下乡运动认知的一个缩影。毛泽东12月21日的指示在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同时，也要求“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里所说的农村同志包括安置知青的省、专区、县各级政府和农村基层干部与农民。在那个政治挂帅、毛泽东的指示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各地对于接收知识青年是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的。但是在欢迎知青来到了农村以后，地方政府、基层干部和农民这些农村的同志是如何做好安置工作的，如何处理知青到了农村后出现的各种实际问题的，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的相关政策是如何在农村落实的，农民又是如何看待这些城里人并与他们相处的，这是知青史研究中一个重要而目前研究尚不多见的课题。

关于知青史的研究，已有不少优秀成果引起学界的关注，但这些成果主要是从知青的视角来讨论问题的。有的著作关注到了农村干部和农民对知青的态度，但着眼点还是知青在农村所面临的困境。³新近有的研究转向了农村，但其重点在讨论知青下乡对城乡关系的影响。⁴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地方政府、农村干部和农民这一不同的视角来审视上山下乡运动。同时，也希望通过农村干部和农民接受知青的事例，讨论毛泽东时代政治动员和高层政策如何在农村层层往下落实的机理，以及农民对政策推行的应对。

1968—1978年十年间上海有11万多知青到江西省上山下乡，其中绝大多数是插队落户。在整个上山下乡运动中，插队落户的知青人数是最多的，问题也是最多、最复杂的，考察江西省接受上海知青的历史过程有助于理解跨省接受知青的情况。⁵本文的基础史料为出版不久的《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史料选编》。⁶这套

² 1968年11月20日，〈王宗仁日记〉；王宗仁，〈另类解读12-21指示的一位“农村同志”〉（上海知青研究中心藏）。

³ 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页275-299、381-445。
【法】潘鸣啸（Michel Bonnin），《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页328-334。

⁴ Emily Honig and Xiaojian Zhao, *ACROSS THE GREAT DIVIDE: The Sent-Down Youth Movement in Mao's China, 1968-198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⁵ 1967-1979年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共计1647.2万人，其中插队1195.15万人，集体场队203.08万人，国营农场248.97万人。在29个省、市、自治区中，按知青中党团员人数、参加领导班子人数，以及发生迫害知青案件、知青死亡人数，江西省都处在中间序列。跨省知青输出城市最多的为上海、天津与北

资料包含了江西省及省内各地区、县档案馆的档案，其中有许多基层的材料，反映了农村干部和农民对于知识青年和上山下乡运动的认识与反应。本文也使用了知青的日记和回忆录，以及对知青和农民的口述访谈。

一、热烈欢迎后的安置困境

“文革”中江西接受的最早一批上海知青，是上海市革委会直接联系江西省革委会后于1968年7月来到井冈山地区的。⁷而大规模接受上海知青是在毛泽东指示发表前后，因此各级政府是将此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贯彻执行的，从省一级开始层层下达至有安置任务的专区、县和公社，并马上分配相应的经费，以确保安置任务的完成。如1969年3-4月份上海有3万多名知青赴江西，江西省革委会在2月底即将安置经费下达至各专区，要求各专区认真贯彻最新指示，妥善安排好上海知青。⁸在下达任务时，各级政府皆反复强调“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最新指示”，将接待与安置上海知青作为当前最重要而光荣的政治任务。相关专区、县、公社和大队的主要领导通常也会亲自负责，以表明对落实最新指示的政治态度。

正是从政治高度上去看待接受上海知青的工作，江西各级政府要求组织好热烈欢迎，于是就出现了“倾村而出”的场面。上海知青一下火车，就有解放牌卡车在等候，将他们送往各自的公社，然后由大队干部和农民将他们接到所在的村庄，安排进提前准备好的屋子。有些地方的农村干部在知青进村时放起了鞭炮，有的农民知道上海人喜欢吃笋，破例挖春笋给知青做菜，以表达欢迎之情。⁹江西省在1968-1970年间大多数地方出现的“盛况空前”的欢迎，反映出各级政府和干部对执行毛泽东指示的政治态度。在他们看来，上海知青不远千里来江西农村插队落户是“毛主席开的介绍信”，是否热烈欢迎知青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

京，接受跨省插队知青最多的省为安徽、河北与江西省（黑龙江接受跨省知青最多，但主要安置在农场）。参见国务院知青办编印，《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1962—1979》（1981），页1、58-69、72-85、17。
⁶金大陆、金光耀主编，《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史料选编》（此后简称《史料选编》），三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⁷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关于上海四十名知识青年到井冈山插队落户的函〉，1968年7月5日，《史料选编（上册）》，页3。

⁸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关于下拨上海知识青年安置经费的通知〉，1969年2月27日，《史料选编（上册）》，页6。

⁹丰城县革命委员会，〈关于接待安置上海知识青年到我县插队落户的情况汇报〉，1970年4月4日，《史料选编（上册）》，页124。夏建丰，《知青私人词典—插队十年：里陂上村杂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页10、13。

态度问题。

既然欢迎和安置知青是一个政治任务，各级政府首先抓的就是“政治落实”，套用熟悉的政治话语和做法营造出一个热热闹闹的政治环境。分宜县提出要做到“三满意”、“三主动”，以及“办好三个学习班”和“开好三个会”，¹⁰这都是“文革”以来流行的政治套路。德安县除了办学习班、吃忆苦饭等相同做法外，还为知青提前准备了毛主席画像和“老三篇”，同样意在突出政治。¹¹这两个县的做法得到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的肯定，并将它们转发各地，加以推广，成为各地的标准做法。¹²各地对热烈欢迎、高调表态以及办学习班和开会这些仪式化的做法驾轻就熟，知青安置的“政治落实”大都能顺利推行。但完成政治仪式的表面文章之后，安置知青的工作需要解决许多实际问题，对此江西各级政府就做不到像“政治落实”那样轻车熟路，出现了不少问题。

在各级政府的工作总结中，排在“政治落实”之后的通常就是组织落实，虽然工作总结或报告总会写上“健全了机构”“配好了领导”这样的话，但实际情况是知青工作的领导机构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处于不健全的状态。江西省革委会为组织、领导知青下乡及干部下放，于1968年10月起成立了省、地、县、公社直至大队的“五七”大军领导小组¹³，但直到1973年落实贯彻毛泽东回复李庆霖来信精神之时，整个省尤其是县和公社两级知青工作领导机构组织不健全的现象仍十分普遍。上海市革委会赴江西省学习慰问团¹⁴在1972年底给江西省革委会的报告中提道：“目前有相当一部分公社没有专职干部；有一部分县名义上有三、五名专职干部，实际工作的只有一两名。而且调动频繁，工作受到影响”，县社

¹⁰ 分宜县革命委员会“五七”大军领导小组，〈关于做好上海知识青年来我县插队落户接待、安置工作的意见〉，1970年2月24日，《史料选编（上册）》，页8。所谓“三满意”和“三主动”即：贫下中农满意，主动进行再教育；下放干部满意，主动争取带队；知识青年满意，主动接受再教育。“三个学习班”和“三个会”是革委会成员学习班、带队干部学习班、贫下中农学习班；以及欢迎会、忆苦会和讲用会。

¹¹ 德安县革委会“五七”大军领导小组，〈接待、安置上海知识青年的报告〉，1970年4月11日，《史料选编（上册）》，页10-11。

¹² 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办公室，〈批转分宜县“五七”大军领导小组“关于做好上海知识青年插队、安置工作意见”〉；〈关于转发德安县〈接待、安置上海知识青年的报告〉的通知〉，《史料选编（上册）》，页7、10。

¹³ “五七”大军领导小组是知青办的前身，1972年江西成立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领导小组及办公室，1974年成立中共江西省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和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1975年省知青办正式从省民政局分出，单独办公。参见金光耀、金大陆主编，《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卷4，页2980；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地缘：上海知青与江西》（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页11。

¹⁴ 上海知青到江西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派出由干部组成的学习慰问团长驻当地了解知青情况，并与江西各级政府沟通、协调解决知青面临的问题。关于江西省政府与慰问团的关系，参见林升宝，〈“继续革命”的困局——上海知青学习慰问团研究（1969—1976）〉（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论文，2016）。

干部的配置“因编制不落实而落空”。¹⁵干部中普遍存在着“安置几个人，应付二、三年”的想法，有的地方甚至出现“组织无领导，青年没人管”的情况。¹⁶江西省革委会副主任杨尚奎在全省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上也指出，江西的很多干部对待知青工作，普遍存在“一阵子”的临时思想，缺乏长期打算。不少领导干部存在着“头年紧、二年松、三年不过问”，“把长期的战略任务当作临时任务，临时措施，临时机构，临时应付”。¹⁷

这种组织不落实的情况，是因为各级政府和干部普遍将知青工作看作是额外的“包袱”和“负担”。¹⁸虽然欢迎知识青年到农村有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是一项政治任务，但是在“文革”时期，中央号召的政治运动并非只此一个，而是接连不断。以1968年底毛泽东做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到1973年春毛泽东回复李庆霖来信这4年多时间来说，全国范围的运动除上山下乡外，还有下放干部、“一打三反”、整党建党、教育革命、批陈整风、批林整风等。而1971年9月前江西省在程世清领导下，还有农业大跃进、工业革命、“一化带七化”等地方性运动。¹⁹每一个运动来临时，上级领导都要强调这是当前的中心工作，因此地方干部的切身感受是：“这也中心，那也中心，冒出多个中心”。²⁰对于各级干部来说，安置知青只是他们面临的诸多工作中的一项。他们会在上级领导强调时在口头上予以“政治落实”，“上面抓一抓，下面动一动，抓一阵丢一阵”。²¹一阵风过去后，则会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来轻重缓急地对待各项工作。于是，知青工作在很多地方及很多时间内就成了一个不重要的或只是一个部门的工作，直到上级领导再次强调其重要性之时。这是地方政府对运动式政治的应对常态，知青工作也不例外。

¹⁵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赴江西省学习慰问团关于学习慰问工作的情况汇报〉，1972年12月1日，《史料选编（中册）》，页381。

¹⁶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赴江西学习慰问团上饶分团，〈在波阳学习慰问的情况汇报〉，1972年7月，《史料选编（中册）》，页421-422。

¹⁷ 省知青工作会议秘书组印，〈杨尚奎同志在全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会议上的传达报告〉，1973年8月，《史料选编（下册）》，页239。

¹⁸ 井冈山专区精简办公室，〈关于召开接收安置上海知识青年工作座谈会纪要〉，1970年3月1日，《史料选编（上册）》，页293-294。

¹⁹ 即思想革命化带动社队公路化、耕地田园化、灌溉水利化、良种矮秆化、养猪糖化饲料化、运输车子化、路边村旁绿化。见胡平，〈军管年代：程世清在江西〉，载氏著，《百年误读》（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1），页231。

²⁰ 清江县知青上山下乡安置工作办公室，〈传达贯彻中央21号文件和毛主席复信，开展知识青年下乡工作大检查情况汇报〉，1973年7月26日，《史料选编（下册）》，页305。

²¹ 上高县上山下乡办公室，〈关于当前下乡知识青年工作的情况汇报〉，1974年5月23日，《史料选编（中册）》，页392。

运动式政治在安置知青中常常出现计划仓促随意、临时变更的情况。新余县1970年原计划接收500名上海知青，结果临时翻了个倍增加到1000人，但县里还表态：“来多少安排多少”，因为“这是上级的战略部署”。²²这样的临时变更导致原先的安排要做相应的调整。波阳县1969年安置上海知青时，临时给3个公社在原先50-80人的基础上各增加了20人，不得不在知青到达农村后重新调拨新的安置经费。²³

缺乏周密的计划以及没有健全的领导机构，使得知青安置经费违规违法使用的现象十分普遍，导致最为突出的问题是知青住房长期无法解决。国家从动员知青下乡一开始就安排了专门的安置经费，其中建房补助占了很大一块份额，江西省及时将这些经费分配下发到各专区和各县。但因为缺少专门机构监督实施，干部中又普遍存在“知青在农村待不长，房子不造没关系”的想法，使得上海知青来了很长时间后住房仍然十分困难，无法在农村安心生活。如波阳县到1972年7月住进新建住房的知青只占全体知青的11.6%，住公房的知青占45%，而借住农民房屋的知青占了42.6%。²⁴新余县到1973年9月在乡知青实有人数1831人，而其中没有住房的却有1743人。²⁵

表 1.

地区名称	截至 1973 年 9 月剩余知青人数	截至 1973 年 9 月无住房知青人数	截至 1972 年挪用知青经费（元）
上饶地区	37531	26084	223959
赣州地区	28505	24377	304427
抚州专区	26007	21555	13754

伴随住房短缺的往往是建房经费问题，那些下拨却没有正常使用的建房经费中相当部分都被各级政府或基层社队或个人挪用甚至贪污。如表1所示上饶地区1972年之前的安置经费被贪污、挪用223959元，截至1973年9月底上饶地区有知青37531人，却有26084人没有住房。²⁶赣州地区1972年之前的安置经费被

²² 《关于知青情况的记事摘要》，《史料选编（上册）》，页132。

²³ 波阳县革委会精兵简政领导小组，〈关于下拨上海知识青年安置经费的通知〉，〈关于重新调拨上海知识青年安置经费的通知〉，1969年3月，《史料选编（上册）》，页229-230。

²⁴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赴江西学习慰问团上饶分团，〈在波阳学习慰问的情况汇报〉，1972年7月，《史料选编（中册）》，页423。

²⁵ 新余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工作办公室，〈关于一九七三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安置费的结算通知〉，1974年5月10日，《史料选编（上册）》，页142。

²⁶ 江西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工作办公室、江西省财政局，〈关于核批上饶地区一九七二年以前城市人

贪污、挪用和滥用 304427 元,截至 1973 年 9 月赣州地区有知青 28505 人,24377 人没有住房。²⁷抚州专区 1972 年之前的安置经费被贪污、挪用和滥用 13754 元,截至 1973 年 9 月抚州地区有知青 26007 人,21555 人没有住房。²⁸安置经费使用中,挪用多于贪污。如吉水县 1971 年对 11 个公社、375 个生产队的安置经费进行检查,发现贪污安置经费 4800 余元,而长期挪用安置经费达 30353 元,其中一个公社就挪用了 10583 元,导致有些知青一直无房住。²⁹会昌县 1973 年初发现全县贪污挪用的安置经费达 48475.67 元,其中贪污 2143.11 元,挪用达 46332.56 元。挪用的经费被不少公社用做了流动资金。³⁰于都县曲洋公社一个大队将 1200 元知青建房费挪用作大队干部工分给分掉了。西郊公社一个大队则将 1 千多元建房费拿去购买耕牛了。³¹到 1972 年底,全省贪污挪用安置经费共 117 万余元。³²

知青住房问题除了因为经费被违规违法使用及干部中普遍存在知青在农村待不长的想法以外,也与建房要增加基层社队的经济负担有关。江西省对插队知青有每人 200 元的建房补助费,但光靠这笔钱还建不了房。有的地方“木材由公社大队自行解决”,有的地方“木工、土砖等由大队自己负担”,形成了“队办公助”的形式。因为要动用基层社队的资源,基层干部和农民对此就不积极,担心“知识青年建新房,队里贴工贴钱又贴粮,社员收入要减少,年终分配受影响”;“有的怕建房垫钱,怕投工影响分值”。“建房吃亏论”是基层的普遍看法。³³基层干部和农民一旦感到吃亏了,就会想方设法寻找补偿。建房经费被基层挪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一想法的结果。

知青安置下来后江西各地还普遍出现了严重的被称为“迫害知青”的问题。

口下乡安置经费的复函), 1974 年 9 月 24 日,《史料选编(上册)》,页 42-43。

²⁷ 江西省财政局,〈关于核批赣州地区一九七二年以前城市人口下乡安置经费的复函〉, 1974 年 4 月 17 日,《史料选编(上册)》,页 398。

²⁸ 〈关于核批抚州地区一九七二年以前城市人口下乡安置经费的复函〉, 1974 年 6 月 7 日,《史料选编(上册)》,页 260。

²⁹ 吉水县革委会五七大军办公室,〈关于清理安置经费的情况报告〉, 1971 年 10 月 27 日,《史料选编(上册)》,页 309。

³⁰ 会昌县革委会上山下乡办公室,〈关于我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几个问题的情况汇报〉, 1973 年 8 月 6 日,江西省会昌县档案馆藏,档号 89-8-23。

³¹ 于都县革委会农业学大寨办公室、上山下乡办公室,〈关于知识青年工作的情况综合〉, 1973 年 7 月 8 日,《史料选编(下册)》,页 301。

³² 江西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工作办公室、江西省财政局,〈关于 1972 年以前城镇人口下乡经费清理情况和有关问题的报告〉, 1974 年 1 月 24 日,《史料选编(上册)》,页 21。

³³ 红阳大队,〈关于新建知识青年住房和厨房的报告〉;星子县革委会五七大军办公室,〈关于红阳大队林场新建知识青年住房的批复〉, 1973 年 5 月,《史料选编(上册)》,页 190-191。峡江县仁和公社革委会五七大军办公室调查组,〈加强党的领导,放手发动群众,搞好知识青年的建房工作〉, 1971 年 10 月,《史料选编(上册)》,页 338。会昌县革委会上山下乡办公室,〈关于我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几个问题的情况汇报〉, 1973 年 8 月 6 日,江西省会昌县档案馆藏,档号 89-8-23。

大规模知青下乡不久，1970年5月中共中央就下发26号档，要求进一步做好知青下乡工作，并强调对破坏上山下乡的阶级敌人，特别是强奸女知青的要严加惩处。³⁴江西省革委会根据中央文件也发文，要求严厉打击破坏上山下乡的犯罪活动，但迫害知青的案件还是频频发生。根据上海慰问团井冈山地区分团走访过的县社不完全统计，1972年12月以前，强奸上海女知青案6起（其中轮奸1起），强奸未遂3起，诱奸21起，逼婚凶杀1起，共31起。而其中干部作案18起，占60%。该地区泰和县一名上海女知青先被回乡探亲的已婚现役军官强奸，该女知青有顾虑没有揭发，找理由调了一个生产队。到新队后又遭强奸，以致怀孕打胎。随后公社的知青工作干部又以调查案情为由，威逼利诱再将该女知青多次奸污。根据同一个不完全统计，在井冈山慰问分团到过的县社中，发生捆绑吊打知青51起，被打78人，有干部在场的45起。其中峡江县就发生38起，被打44人，干部在场的34起。³⁵在新余县，1973年8月以前发生迫害知青案件18起，其中殴打3起，强奸1起，诈骗诱奸1起，诱奸13起，这些案件中最终判刑的有4起。³⁶在全省层面，1973年判处强奸女知青死刑的罪犯有3人。缺少1973年以前全省迫害知青案件的数据，但在此类案件下降以后的1974年全省一共处理了293件。³⁷

二、地方政府应对困境的努力

江西在接受和安置知青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在全国具有普遍性，有些地方还要更为严重。为此，福建知青家长李庆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反映了自己儿子在农村无法自给自足、住房困难以及对未来的担忧，1973年4月毛泽东在回复李庆霖的信中指出“全国此类事情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此后，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调整并加强知青工作成为中央下达的新的政治任务。

毛泽东复信传达后，江西全省的知青工作出现了一波新的政治动员浪潮，再次成为中心工作。8月下旬，江西省召开全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根据

³⁴ 《中共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军代表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下乡工作的报告》，1970年5月，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³⁵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附江西省学习慰问团，《关于学习慰问工作的情况汇报》，1972年12月1日，《史料汇编（中册）》，页379。

³⁶ 新余县上山下乡办公室，《关于全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情况的调查报告》，1973年8月4日，《史料选编（下册）》，页321-322。

³⁷ 《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卷4，页2967、2983。

中央文件精神,制定了做好知青工作的新措施。各项措施中首先是加强领导,健全机构,从省一直到公社各级都要建立知青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和办公室,直属党委领导,由一名党委副书记主管,并规定了各级机构专职干部的编制名额。会议还提出要对知青下乡中出现的安置经费、住房、按劳取酬、分配兑现等问题一个一个地抓紧解决。³⁸在此前后,各级政府闻风而动,层层传达并组织学习关于毛泽东复信的21号文件和关于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的30号文件,对照检查本地区的知青工作。如新余县7名县委主要负责人到7个公社59个知青点宣讲中央文件,县委还派5个调查组和1个项目组到7个公社开展重点调查,各公社则组织了51个调查组,由第一、二把手带队到全县242个知青点检查工作。³⁹会昌县由包括县委书记在内的11名县委常委带队,从县机关抽调了116名干部组成18个工作组到各公社去宣讲中央文件和检查工作。⁴⁰这种贯彻执行中央文件的政治态度和热情,延续了欢迎接待知青时的“政治落实”。

知青工作改进中,最立竿见影的是加强机构,补充干部。如九江地区在中央30号文件前,县一级知青办(乡办)共有专职干部42人,落实文件一年后增至65人,在上海慰问团看来,这些干部大多数责任心强,工作比较得力。但即使像九江地区那样认真落实中央文件,专职干部增加显著的地方,仍然存在问题:“有些机构流于形式,有些干部不能适应这项工作,有些干部则专职不专用。乡办干部调动频繁,很不稳定。”如德安县一个公社的乡办干部已是第十任了,而且离职到南昌几个月未回来。在干部调配中,“『强』一些的干部其他部门在使用不肯放;『弱』一些的调去不顶用”的情况也很普遍。⁴¹而有些地方则连补充干部也无法落实。武宁县6个公社应配8名乡办干部,但只配了5名,其中3人是体弱者,另两人还要兼管其他工作。⁴²峡江县知青办副主任刘璧瑛从1969年开始做知青工作,县公安局长和县委组织部长都兼任过知青办主任,都因认为知青不好管、知青工作难做而去职,主任职位一直空缺,由副主任负责全县知青工作。

³⁸ 《全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1973年9月4日,《史料选编(下册)》,页246-248。

³⁹ 新余县上山下乡办公室,《关于全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情况的调查报告》,1973年8月4日,《史料选编(下册)》,页314。

⁴⁰ 会昌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关于学习贯彻中共中央(1973)21号文件的情况汇报》,1973年2月18日,会昌县档案馆藏,档号89-8-20。

⁴¹ 《关于五个月来学习慰问工作的情况汇报——上海学习慰问团九江分团在九江地委召开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74年8月19日,《史料选编(中册)》,页407。

⁴² 武宁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办公室,《关于对黄段等六个公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情况的调查汇报》,1974年4月17日,《史料选编(中册)》,页414。

清查并用好安置经费是改进知青工作的重用内容,前述有关贪污挪用问题很多就是这时查出来的。全省知青工作会议后,江西省财政局马上给各地区、县财政局发文,指出以往“在经费使用上无人负责,放松管理,存在很多问题”,要求各地对安置经费“进行全面的检查、清理”,“凡是无账的,一律重新补账”;与其他经费合在一起的,“必须分开立账”;“凡是不符合规定的开支,一律不予报销”。“对于贪污安置经费的,必须严肃处理,并追回全部赃款;挪用安置经费,挪用单位必须深刻检查。并限期如数归还挪用的资金。”⁴⁴同时,作为积极落实中央30号档的具体措施,江西省革委会决定将知青建房补助费提高到220元,并给1972年底之前下乡的知青每人发医药费10元、学习材料费10元、特殊开支15元,一共补助35元。⁴⁵江西省革委会的这一决定是对毛泽东“统筹解决”指示的政治表态和落实,是对运动式政治的习惯性应对。因为是政治决定,江西省革委会决策时没有也不会去考虑本省财政的实际情况。这笔每人35元的补助费全省合计达994.3万元,超出了江西省财政的支付能力。而财政部对江西要中央帮助的请求是将皮球踢了回来,请地方自行解决。于是,江西省革委会做出决定3个月后不得不就通知各地暂不支付,一年后正式下文,表示“我省财政收不抵支”,对补助费的规定停止执行。⁴⁶“政治落实”最终受制于自身的财力。这是经济落后的江西难以接纳并安置好十万多上海知青来插队落户的重要原因。到上山下乡运动后期的1976年,江西省知青办向省委提出从全省机动财力中安排十分之一资金即500万,用于支持知识青年,但省财政局只能安排100万。⁴⁷财力仍然限制了江西省的知青工作安排。

改进知青工作的另一个重要举措是调整插队的组织形式,组建青年队。1973年8月,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提出在人民公社里建立集体所有制的青年队;在土地比较多的地方,单独建立以下乡知

⁴³ 对刘璧瑛的口述访谈,2018年12月25日,江西省峡江县。

⁴⁴ 江西省财政局,〈关于清理历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安置经费、抓紧解决以前上山下乡青年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的通知〉,1973年9月28日,《史料选编(上册)》,页14-15。

⁴⁵ 〈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1973年9月,《史料选编(下册)》,页249。

⁴⁶ 江西省财政局,〈关于1972年以前下乡知识青年每人增加的补助费暂不支付问题,请补发档以便各地执行的报告〉,1974年3月29日;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关于1972年以前下乡知识青年“三项”补助费问题的通知〉,1974年11月18日,《史料选编(上册)》,页29、51。

⁴⁷ 江西省知青办,〈关于从财力、物力上给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以必要支援的请示报告〉,1976年3月24日;〈关于扶助知青经费的问题的函〉,1976年6月30日,《史料选编(中册)》,页500-501。

识青年为主，由带队干部和部分贫下中农参加的集体所有制农场。⁴⁸与此同时，对在乡知青的布点布局加以整顿，居住过于疏散的进行集中，条件过于艰苦的调出另行安置，这就是所谓的“集并”。⁴⁹根据中央文件精神，江西着手将居住分散的知青调整集中到条件相对好些的生产队。如崇义县将原分散在5个大队17个生产队的53名知青集中到3个青年队及两个青年点。⁵⁰乐安县谷岗公社则集中了两个大队的上海知青，创办了两个独立核算的知识青年生产队，两个生产队都实现了粮食丰收，工分值超过一元，做到了自给自足。⁵¹定南县把分散插队的271个点的知青集并起来，创办了32个农、林、茶场（队）。⁵²赣州地区有615个青年场、队，其中155个青年场队的粮食生产上了“纲要”⁵³。公社、大队与挂钩单位都给予这些青年场队很大支持，开展了种、养、加工多种经营，兴办了各种类型小作坊。⁵⁴

对于劳动力不强的知青，江西各地在1973年之后也给予一定的照顾。除了安排他们当会计、保管、记工员和大队民办小学教师、赤脚医生、广播员，以及安排他们进入队、社企业等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即组织他们成立综合农场、林场、小手工作坊等等。新干县鸡峰公社将当地病弱知青集中起来，创办“五·七”综合场，搞木器加工，修理喷雾器，做杀虫用的黑光灯，给农民照相、缝纫等，因人制宜安排他们力所能及的工作，两三年后生活便自给有余，固定资产达5万余元。⁵⁵鸡峰公社的东岭背青年队1974年底建队时13人，到了1977年发展到31人，粮食产量从300斤增加到500多斤，全年总产值1975年为17000元，1976年为25000元，1977年预计可达30000多元，工分值稳定在1.2元，

⁴⁸ 《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会议的报告》（1973年7月24日），国务院知青办编，《知青工作档选编（内部发行）》，1981年，页89-90。

⁴⁹ 参见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页409。

⁵⁰ 上海赴江西学习慰问团赣州分团，《上海赴江西学习慰问团赣州分团调查情况汇报》，1974年7月21日，《史料选编（中册）》，页450。

⁵¹ “两个青年队办队情况的调查”，上海赴江西学习慰问团，《情况简报第十四期》，1974年5月，《史料选编（中册）》，页431-432。

⁵² 《认真贯彻会议精神，努力做好学习慰问工作——上海市赴江西学习慰问团政委刘长江同志在全省知青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75年7月21日，《史料选编（中册）》，页382。

⁵³ 即中央制定的《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规定的粮食亩产量“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一九五五年的四百斤增加到八百斤”，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档汇编（1949-1957）》（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页762。

⁵⁴ 中共赣州地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一九七六年知青工作基本情况和一九七七年知青工作的计划（草稿）》，1977年3月，《史料选编（下册）》，页330-331。

⁵⁵ 《认真贯彻会议精神，努力做好学习慰问工作——上海市赴江西学习慰问团政委刘长江同志在全省知青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75年7月21日，《史料选编（中册）》，页383。

所有青年除去粮油开支，平均进款 250 至 350 元。⁵⁶

以上这些举措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知青到农村后面临的困难，但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新干县的阳团大队知青队办了一个小企业，要利用当地的木材加工电灯插座，机器已从上海买来了，但林业部门说林木产品是国家一类物资，县以下单位包括知青队不能生产，于是小企业就黄掉了。⁵⁷修水县一个大队允许男青年除农忙季节外可以上山砍柴搞副业，一天收入可达 3 元，但被批评为是将青年引上资本主义邪路。⁵⁸知青通过自己的劳动改善生活的路被计划经济和公社体制堵死了。此外，成立青年队是作为解决知青下乡问题的政治任务提出的，在成立和运作初期都有政策的特别扶持，包括来自上海的支援。如前面提到的乐安县谷岗公社两个知青生产队，能做到工分值超过一元，实现自给自足，有两个决定性因素。一是生产大队的支持。其中一个知青队建队费用 13038 元，国家下拨的建房补助款只有 4500 元，其余 8538 元是由大队支付的。二是划拨山林供知青砍伐木材毛竹，成为两个知青队收入的重要来源。而这样的支持显然是不能长久的，比如砍伐会出现“与民争利的现象”，影响知青与当地农民的关系。⁵⁹所以如果缺少政策支持，青年队也就难以为继了。70 年代末知青回城后，清理知青财产时发现大量知青队是亏损的。例如新余县各知青队欠国家贷款共计 47000 元，但此时知青都已经离开，形成“队无人，债无主”的状态。⁶⁰

由于接受的是上海知青，江西省通过上海慰问团从上海市获取了相当可观的经济、物资援助，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接受知青中出现的问题。例如大量成立的青年场队，就是赣沪两方面积极互动的结果。上海以低价或无偿支援各种机械设备，使江西各级政府扶持青年队的工作得以较为顺利地开展。1973 年，在贯彻中央 30 号文件精神时江西省委规定，“办集体所有制青年队、场，所需支援的机械设备和资金，由省知识青年办公室提出计划，报省计委安排供应”，1975 年又进一步规定，对青年队，要“从地方各级机动财力中，从国家支援人民公社机械化补助款和水利投资中，从支农的物资中，每年安排一定的指标，从财力、物力上给

⁵⁶ 井冈山地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会议典型材料摘要，〈创业艰难百战多 新干县鸡峰公社东岭背青年队〉，1977 年 10 月，江西省吉安市委党史办编，《上海知青与井冈山》（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页 96。

⁵⁷ 王战口述、金大陆采编，〈上海知识青年留在井冈山的足迹〉，《世纪》期 6（2018）。

⁵⁸ 〈关于五个月来学习慰问工作的情况汇报〉，《史料选编（中册）》，页 409。

⁵⁹ 〈两个青年队办队情况的调查〉，《史料选编（中册）》，页 433。

⁶⁰ 新余县知青办，〈关于知青经费、财产清理工作情况的汇报〉，1980 年 8 月，《史料选编（上册）》，页 172。原书为 47000 万元，“万”应是误加。

予适当扶植”。江西省委的这些决定，与前面提到的给知青 35 元补助费一样，是作为一个政治任务提出并下达的，并未认真考虑其实施的可行性。因此省计委等职能部门无法贯彻落实，安排供应相关的机械和资金。在政府机构中处于弱势的省知青办只能揽下责任，检讨自己“工作努力不够，至今基本上没有落实”。幸好有上海的支持，“措施有力，落实很快”，从 1973 年开始为江西省提供了手扶拖拉机 2360 台，丰收 35 型拖拉机 260 台；办小作坊等所需的汽车、柴油机、车床等设备和物资价值 380 多万元；长期无息贷款 175 万元。⁶¹这一事例再次表明，江西在经济上没有能力接纳 10 多万上海知识青年，也就无法做好“应当欢迎他们去”的工作。❏（未完待续）

【评论】

“状告海关案” 跟进报道（69）

李南央（美）

纵恶即是作恶

我在上篇“跟进”结尾处告与大家：收到北京第三中级法院于 2020 年 2 月 25 日签发的第 19 次“延审通知书”。这份在疫情中发出的通知，让我挺感慨的。贾志刚合议庭长在北京并没有恢复正常生活，城内各居民小区仍严密封锁，外人不得入内的时候，能想着“李南央状告海关案”上一次的“延审”不日到期，及时写就再次延审因由，交本院上级批准，递交北京高级法院核准，可谓“恪尽职守”。查百度百科，恪：谨慎，恭敬，尽：完善。

这次爆发于武汉的中共病毒，迅速蔓延到全国，进而肆虐于全球，皆因中共最初的掩盖真相。具体到执行“掩盖”的那个人，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上面”责令组成了国家监察调查组，调查李文亮医生被训诫的事实真相。公之于世的是：“由于中南路派出所出具训诫书不当，执法程序不规范，调查组已建议湖北省武汉市监察机关对此事进行监督纠正，督促公安机关撤销训诫书并追究有关人员责任，及时向社会公布处理结果。”我点击《新京报网》发布此消息页下的“处理

⁶¹ 江西省知青办，〈关于从财力、物力上给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以必要支援的请示报告〉，1976 年 3 月 24 日，《史料选编（中册）》，页 500。

结果”：“武汉警方对李文亮医生被训诫一案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栏目，跳出了一行字：“您要访问的页面不存在”。

这就是了。无论掩盖真相的结果是多么的惨烈，具体捂住李文亮医生的那只手是在“谨慎”、“恭敬”且“完善”地执行着中国执政党一贯的方针政策，党怎么会惩处恪尽职守的奴才？正如朱正先生在本文“引录栏”内对鲁迅先生《药》一文的分析，当权者认为自己统治下的人群光是愚昧还不够，还要促使他们尽量地堕落。在解除了“封城”的武汉，当火葬场外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等待着领取亲人的骨灰时，当人们想用手机拍下这刻骨铭心的场景时，耳边响起的不是慰寄的哀乐，而是一声断喝：“不许拍照！”

我在这里的电视屏幕上看到，在意大利，望不到尽头的军车，搭载着精美的棺木，每个棺盖上摆放着一支鲜红的玫瑰。那长长的车队驶离已经不堪重负、无法承担火化的城市向另一个城市的火葬场缓缓地移动。那场面撞击着我的心灵：深重无边的哀恸，动人心弦的庄严。

鲁迅先生说：“假使此后光明和黑暗还不能作彻底的战斗，老实人误将纵恶当作宽容，一味姑息下去，则现在的混沌状态，是可以无穷无尽的。”我要说，中国已经混沌得太久、太久，纵恶不再是因为误作宽容，姑息作恶不可再视为因其老实，所有宽容作恶者的人本就是作恶中的一员。贾志刚合议庭长，我对你绝不宽容！你助纣为虐！若不想继续堕落下去，请爬出身陷的罪恶泥潭！

【评论】

百万英镑与北戴河

张保和（美）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有一本小人书，名为“百万英镑”（The Million Pound Bank Note）。这是美国作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在1893年写的一个虚构的故事，后来被拍成电影，我家的那本小人书就是由那部电影中的一些银幕画面制成的。故事是讲在英国有极为富有的兄弟俩。他们在打一个赌：如将一张一百万英镑面值的钞票借给一个不名一文的穷人，为期一个月，那张钞票是否可以改变那个人的命运。兄弟中一人以为可以，另一人则持否定态度。在十九世纪末的百

万英镑应该起码和现在的亿万英镑差不多，是一笔很大的财富。当然，为了保证那张钞票不被盗窃，并被很好利用，一个必要条件是那个人必须诚实且聪明。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因航海事故从美国旧金山漂泊到英国的年轻人，亨利·亚当斯，正在伦敦的街头游荡，身无分文，饥寒交迫。他在路过那对打赌的兄弟俩的豪宅前时，试图捡起地上一个被别人丢弃的苹果充饥，被兄弟俩看到，并被选中，成为他们赌注的参与者。

这个赌注的关键是那张百万英镑钞票只是暂时借给亨利，一个月后，亨利须原封不动将其归还。所以，亨利不能直接利用那张钞票的价值赚钱，如用那张钞票买股票投资等，而只能是间接的运用拥有那张钞票的形象为自己谋利。

后来亨利利用这张钞票，给人以百万富翁的形象，于是大家竞相向他示好，献媚，为他提供各种好处，便利。其间当然也不无周折。故事里非常生动的描写了人们在对他的财富有疑问时，对他的怠慢，轻蔑，及无礼，其反差之大，尽显人间世态炎凉。后来亨利还是利用那张钞票发了几万英镑的财，还给自己找了一个美丽的妻子。当然，在一个月底，他又将那张百万英镑钞票完璧归赵，还给了兄弟俩。结局可以说是皆大欢喜。

这个故事揭示了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钱当然重要，但给人以有钱的形象几乎更为重要。拥有财富的形象自身就能被转换成钱，转换成财富，或几乎就是钱，就是财富。但这个故事和北戴河有什么联系呢？下面就是我在北戴河经历的一个真实故事，待我慢慢叙来。

我在1975年三月从内蒙回到北京后，在后来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处于“待业”状态，其实就是失业。这在当时上山下乡回城的青年中是一种“常态”。1975年七月初，我们的一个名为“猫咪”的朋友刚从北戴河和一些军队的朋友避暑归来。她有声有色地向我们讲述她在那里的经历。除了风景，气候，生活等一切都美好无比外，她还说那里的空置别墅极多，随便找一幢便可住宿。这一切让我们动了心。我和另外的两个朋友，夏炎，夏焜兄弟俩，决定也去北戴河一游。临行前，猫咪的妈妈，宝珍阿姨，给了我们一张商业部的介绍信，以备万一。介绍信的具体内容已经记不清楚了，好像就是“兹有我部子弟某某某，某某某到北戴河度假，请与提供便利。”。下款好像是商业部办公厅及其公章。

在七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我们一行三人在北戴河火车站下了车，从那里再乘

公共汽车到达北戴河。下了汽车，猫咪所描述的那些空置别墅根本不见踪影。原来那些空置别墅都位于高干度假区域，平民根本没有权利进入。再稍加打听后，得知北戴河当时只有一个平民可以住宿的旅馆，北戴河宾馆。所以这也成了我们唯一的选择。北戴河是个很小的城市，从汽车站到北戴河宾馆，走路几分钟就到了。一路上，几乎看不到人，非常安静，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北戴河的干净，加之很多建筑都是白色，更衬托了北戴河山清水秀优美的环境。对于刚从内蒙戈壁滩回来的我来说，这简直是人间仙境。

北戴河宾馆是坐落在海边的一幢两层小楼。到了那后，我们向工作人员说明了来意，也出示了商业部的介绍信。但被严词拒绝，因为当时政府有政策，严格禁止旅游，任何人一律不接待。所以说当时北戴河的人那么少。可是猫咪不是刚从北戴河度假回来吗？原来这个政策是对一般人的，而不是对高官的。但我们已经来了，北戴河的秀水青山近在咫尺，绝不能轻易放弃。我们开始费尽口舌，好话说尽，请求旅馆工作人员网开一面，但不管我们怎么磨，他们完全不为所动，公事公办，国家政策，不能违反。

当时已经近下午四，五点钟，从北戴河回火车站的汽车已经没有了。即使是回到火车站，也赶不上当天回北京的火车了。所以我们当晚的住宿都没有着落。正在这个尴尬的时刻，我们其中的夏炎灵机一动，提议既然我们有这张商业部的介绍信，何不去当地的商业局试试。商业局没几步就到了。那时北戴河基本没有楼房，商业局坐落在一个平房院落里，局长办公室正对着大门。进去后，发现商业局长是一个中年胖男子。七十年代物资普遍匮乏，胖子很少，想必那商业局长的位置一定是个肥差。我们向局长说明来意，并将那张商业部的介绍信递上。

局长看了我们的介绍信后，也没有说什么，马上打电话将属他所管辖的北戴河饮食服务公司的总经理叫来，因为北戴河宾馆就是在北戴河饮食服务公司之下。总经理很快就来了，局长指示他把我们带回北戴河宾馆。于是总经理在前，我们一行在后，又回到了北戴河宾馆。在路上我们心里还有些嘀咕，担心旅馆工作人员还是坚持原则，公事公办。

回到宾馆后，我们所受到的待遇和上次有天壤之别，证明我们的担心完全没有必要。那些旅馆工作人员对我们极为热情招待，简直让我们受宠若惊，之前对我们的严词拒绝似乎没有任何记忆，政府的禁令也不见踪影。其反差和百万英

镑故事中亨利的经历绝对有得一比。我们在北戴河宾馆住了大约一个星期，是旅馆里唯一的客人，度过了一个极为愉快的假期。

想起来，我们在北戴河的经历和百万英镑的故事的确有很多相似之处。百万英镑的故事里的亨利靠一张钞票改变了命运，而我们靠一张介绍信改变了我们一次旅行的命运。所不同的是，和资本主义社会不一样，中国是一个权利社会。钱不是一张万能的通行证，而权利则是万能的。我们其实没有任何权利，但那张商业部的介绍信暂时将我们和权力联系起来，成了我们的“百万英镑钞票”。

但和金钱相比，用特权来分配资源有其复杂性。财富有一个统一的存在形式，那就是货币。一个人占有的几乎任何财富都可以用货币来表达，而货币的多少决定了他可支配的社会资源。但特权没有一个统一的物理存在形式，这就导致了用特权分配社会资源的随意性，偶然性。在很多时候，个人判断或感觉决定了特权分配的与否及多少。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那张介绍信在旅馆工作人员眼里不管用，而在商业局长那里作用就这么大。对于旅馆职工来说，商业部离他们太远了，还感觉不到那张介绍信的分量，而对商业局长来说，就不一样了。其实，那个局长也不过是一个科级七品芝麻官，但他已经在这个官僚体系里爬上了几个台阶，绝对不希望得罪上面的任何人以至于影响他的升迁之路。

这也让我想起了另一些有关特权分配的趣事。在八十年代里，我父亲有一次出差，住在某省的省宾馆。在临回京前，他招待同行的大概六、七个同事吃了一顿饭。饭后拿到账单，让他大吃一惊，因为价钱极低，只有几块钱。原来这个宾馆有两种价格，一是对一般人的价格，另一是对所谓首长的特权低价。但要判断一个客人的身份并不容易，也不能走上去问每一个客人的职位高低或查证件，很多时候只能靠猜。起码在猜我父亲的身份时，他们就猜错了，给了我父亲首长待遇。自然，我父亲也没有试图纠正他们的错误。

还有一次在大约七十年代末，我父亲杭州老家的一个费姓朋友的军人儿子来看我们，和我们一块去北海团城看一个从浙江来的展览。进了展览厅后，人家对我父亲格外客气，领导出来招待，还给端茶倒水，搬椅子，也不清楚为什么。后来我们分析，他们一定是把小费当成了警卫，把我当成了司机，而把我父亲当成了一个高官。

我们在北戴河大多数时间是在公共海滩上度过，或在海里游泳，或沙滩上晒太阳。因为那时北戴河基本没有任何游客，虽然是公共海滩，但也几乎为我们所独有。我刚刚在内蒙种地六年，一天到晚风吹日晒，皮肤早已黝黑了。但到了北戴河，还热衷于晒太阳，背上都晒脱了皮。现在想起来，真是多此一举。

北戴河的高干海滩和公共海滩紧邻，但一般人不能入内。在海里，高干海域和公共海域也用防鲨网隔开。我们注意到公共海滩用单层防鲨网，而高干海滩则用双层防鲨网。这在中国当然也是司空见惯的特权，但在外国人眼里，就不是那么容易理解。我记得多年后听一个目睹这种现象的美国人问，为什么他们觉得鲨鱼比较喜欢去吃首长。

在北戴河还发现了另一个较隐蔽的特权，那就是天津有名的起士林西餐厅。原来，起士林西餐厅在每个夏天都在北戴河开一个分店，专门为度假的特权阶层服务。那里居然有当时在北京都很难见到的炸大虾这道菜，而且价钱也不贵，很可能也是特权价格。我们当然要趁机享用一番，给我们的假期又带来不少饮食上的享受。

虽然只是短短的一个星期，我好像已经习惯了在北戴河这个小小世界里的特权生活。回到北京后，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都有一点失落感，因为我每天又要去排队，挤车，为争取到我自己的那份有限的社会资源而奋斗。

读到这里，大家可能都同意宝珍阿姨的那张商业部的介绍信对我们的北戴河之游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现在想起来，她以在政府机关工作多年的经验，一定想到了我们很可能在北戴河碰壁，于是主动为我们提供了这张介绍信。后来和一个熟悉北京官场的朋友谈起此事，朋友说北京的部委很多，也并不是每个部委的介绍信都会有同样的效果。那张商业部的介绍信如此管用，是因为它正好是餐饮部门的顶头上司。

极其讽刺的是起码在表面上，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取消特权，使其人人平等。所以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七十年代，起码从经济来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也应该算是一个极为平等的年代。在收入上，大家都拿政府工资，最低和最高工资之间大约只有十倍左右；在穿着上，大家都穿一样的蓝制服或绿军装；在交通工具上，基本都用自行车或公共汽车；在饮食上，食品供应基本都需票证，即使是有钱，谁也不能多买，另外在那个时期很多高级饭馆也都关了门，起码考

究的菜都不做了；在居住环境上，大家都住政府宿舍。但就是在这样的表象之下，还是有各种触目惊心的特权，好像特权在中国是一个打不倒的不倒翁。当然，这些生活上的特权和现在动辄涉及上亿元的贪污腐败可能是小巫见大巫。

1996年夏我因事到秦皇岛，特意回北戴河旧地重游。只见公共海滩上人头涌动，几乎人满为患，和我印象里的宁静，整洁的北戴河不可同日而语。这应该是这些年的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变化，表示人们的钱多了，而用钱而不必用特权来取得的享受也比以前有所增加。不过北戴河的高干疗养区还是封闭的，估计和从前没有太大变化，显示了中国作为一个权力社会这一性质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如果将来有一天中国摆脱了特权的束缚，那将是中国社会的一大进步，起码在社会资源分配上，会简单很多。

“百万英镑”是在一百三十年前写的，反映的是英国当时的社会现象。作为一个虚构的故事，它多少有些夸张的成分。一百三十年后的今天，英国和其他西方社会也改变了很多。普世价值，如人权，公正，正义，社会福利等观念，已经成了社会的基本共识，故事中描写的那种对于金钱的崇拜应该也有所减少。❏

【评论】

知识青年的榜样邢燕子

唐 燕

一

众所周知，邢燕子是知识青年的先进典型。在“大跃进”的1958年，全国共有两千多万农村青年进城支援国家工业建设，本可回到天津市父母身边工作或继续求学的邢燕子却反其道而行之，自愿留在家乡宝坻县农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力量。当年邢燕子选择的这条人生道路符合1956年《农业发展纲要》向知识青年提出的上山下乡要求，更响应了1955年毛泽东“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可是当时的媒体并没有发现和宣传她。

1960年“大跃进”受挫，城里的千万农村劳动力过剩了。为了度过危机，陈云提出充分发挥农村广阔天地的蓄水池作用，以吸纳城市的大量过剩人口。但那些亲身体会了城乡巨大差别的农村务工青年鲜有愿意返回家乡的。为此，当年

9月2日的《人民日报》刊发了《河北日报》和《唐山劳动日报》记者联合采写的长篇通讯《邢燕子发愤图强建设农村》，赞扬邢燕子“听党的话，不怕去年严重灾害带来的困难，坚决留在农村”，称她是“扎根农村的第一代新型农民”，并号召青年和广大群众，特别是滞留在城里的农村青年向邢燕子学习。《人民日报》在导语中说：“邢燕子的事迹鼓励着广大青年发愤图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党需要千千万万像邢燕子那样眼界宽阔而又有雄心大志的青年。”

1964年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邢燕子随之被树为知青榜样。1968年上山下乡作为一场运动轰轰烈烈大规模展开后，邢燕子又一再被广为宣传。誉满全国的邢燕子觉得“只有干得更好才能对得起知青的榜样”这个称号，她数十年如一日地奋战在农业生产第一线，为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突出成绩。她先后受到毛泽东5次、周恩来13次接见，从生产队、公社、县、市到省，从妇联、共青团到贫代会，担任过16个大小不同的领导职务，官至中央委员、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天津政协副主席，还当选过五届党代会代表、三届中央委员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尽管如此，她一直是农民身份，大多数时间仍生活在最基层的农村，干最普通的农活儿，挣的是生产队的工分。

粉碎“四人帮”后，像其他知青典型一样，她也受过政治审查。但与昙花一现的他们不同，在2009年建国60周年之际，邢燕子被评为“全国双百人物”（“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在建国70周年的2019年又被评为“新中国最美奋斗者”，荣幸地站在了历史延长线上。2022年4月6日，邢燕子不幸病故，享年81岁。

二

晚年的邢燕子说，“我这一生就跟说笑话似的，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全是急转弯。我没想出名却出名了，还闹到中央去了。我没想当官却有了那么一大堆职务，可是等我想继续革命工作的时候，却突然什么也不让我干了……你说是笑话不是？”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既然她成了典型出了名，必然有时会身不由己：

她的事迹见报后，写给她的信从全国各地涌来，其中不乏表达仰慕之情的求爱信。地方党组织便不失时机地为她选定了长她六、七岁的老党员、生产小队长王学芝。起初邢燕子“不乐意”，但老王“政治上可靠”，“是党决定，爷爷同意的”，“就服从了党的安排。”这个“服从”后来被称颂为“进一步表明她永远扎根农村的决心”。晚年的邢燕子在提到她的婚姻时说：“我们是先结婚后恋爱”，“我俩几十年没有吵过架，但也没有说过什么悄悄话。”

文革初“说我是‘黑典型’，是刘少奇培养的。可是到了后半截，又说我的错误就是批过刘少奇。”毛泽东去世时她和侯隽联名写了封悼念信寄给了江青，因而在后来的审查中，她被冤屈成“向江青效忠”，还被怀疑是“三种人”。后来经时任中组部部长胡耀邦为她说了话“邢燕子是党培养起来的，她不是‘四人帮’培养的”，才得以解脱。

尽管邢燕子身上留有这些不可避免的时代印迹，但总的来说她的一生是幸运的，因为她所迈出“留在农村”那关键的一步完全是她自己的意愿，是她的主动选择，没有被强迫的痛苦。还因为她熟悉农村，无须经历适应陌生环境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她的选择恰逢其时，符合党和时代的需要，因而获得了不少崇高的荣誉和地位，虽然那些并不是她的追求。

天津作协党组书记王林 1960 年 9 月 22 日对邢燕子的采访日记，其中有一些我们以前不知道的细节：

“燕子的亲娘早死，她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

“她在小学就是模范少先队员，少先队的大队长。”

“她从小就爱帮助小朋友，阶级精神特突出”。

1958 年她在宝坻县巴庄子“农业中学未毕业到村参加生产”；

“她父亲在土改时当几个村的联合主任，对开展工作甚有贡献，‘搬石头’时被搬过”；

“燕子从小就爱劳动，而且愿跟男子在一起干活，对于动脑筋的事倒不感兴趣。”

由此我们得知，邢燕子并非以往所宣传的“初中毕业回到农村”，而是“农业中学未毕业到村参加生产”。可见，“感动中国人物列表”冠以她“全家都在

城，自愿留家乡”不是实事求是的。这条冠名语引自郭沫若1960年9月写的《邢燕子歌》。

尽管我们不知道她“阶级精神特突出”具体指什么，但在多年宣传介绍她的资料中，我们没有看到她参与阶级斗争，利用职权批人斗人整人害人之类的内容。根红苗正、身居高位的她在阶级斗争为主旋律的年代里能把持住自己，实在难能可贵。这首先缘于她善良的本性；也因为她熟悉农民，懂得农村传统宗族形成的强大血缘关系不是阶级斗争理论可以轻易撼动的；还或许“她父亲土改‘搬石头’时被搬过”对她产生了影响？总之，她没像许多下乡知青似的对阶级斗争理解得那么肤浅，那么容易被煽动和利用。即使后来在“四人帮”肆虐时期，她也没如有些知青典型那样头脑发热忘乎所以，以至于作出“反潮流”之类的行径。

徐庆全对最后那条细节评论道：“王林隐含的意思是，邢燕子干苦活累活没问题，读书或者搞点农业科技方面的事情不灵。”难怪，在诸多有关她的报道中没有见到她搞“科学实验”之类动脑筋的事迹。进行“科学实验”需要掌握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的基础知识，还要将其运用到生产实践中并发挥出效益，谈何容易？当年一些知青通过培养某种菌类提高农作物产量的“科学实验”，无不以短命和失败告终就是明证。有自知之明，清楚农业科技应交由专业技术人员承担的邢燕子不会那么脱离实际。

三

“全国双百人物”的评选语称邢燕子“在我国农村经济最困难时期成为‘发愤图强、扎根农村、大办农业’的青年典型”。

这段评语没有提及她参加毛泽东1962年提出的“三大革命运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如前所述，这是符合邢燕子的实际表现的。这其实也是对她的褒奖。她所以能如此，倒不见得是她有多么远见深邃的思想，而是源于她的简单和质朴。

至于评语里提到的“扎根农村”，无疑上山下乡运动是逆城市化、逆历史潮流的。要彻底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就必须走城市化的道路。城市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一个国家城市化水平的高低表明其发达程度。既然把广阔天地当作蓄水池，就应该控制、调节好水的流进流出，知青就不该被提倡“扎根农

村”，成了一潭死水。云南知青在1978年末掀起的全国范围的知青大返城风潮就表明，蓄水池也会变成引发洪水的堰塞湖。知青们最终用脚彻底否定了“扎根农村”，否定了上山下乡运动是历史的必然。迟至上世纪八十年代，邢燕子和她老伴儿及两个儿子也先后理所应当地“农转非”了。改革开放以后，不仅允许所有知青返城，而且允许农民进城就业，还鼓励农民迁入小城镇，城乡间的壁垒终于松动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城市化率如今已经达到了世界平均水平的50%左右，可喜可贺。

不知为何，这段评语用“青年典型”取代了邢燕子原本“知青典型”“知青榜样”的称号。是评委会有意淡化邢燕子的知青名份，还是毕竟上山下乡运动是一段令我们民族伤痛和尴尬的历史而不愿再提？毋庸置疑，知青是一个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不可复制的群体，（今后即使有人走回头路，让城里的青年学生，无论因就业危机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上山下乡，那些青年也将与“共和国的长子们”不可同日而语了。）无论作为整体还是个人，都承载着共和国一段不可回避的历史，是那个特殊年代的亲历者。知青参与了罪恶文革的全过程，既是原告，也是被告，还是见证人。对知青不管怎样评价如何褒贬，起码首先应正视“知青”这个有着鲜明时代特点的身份称谓，而不该轻易抹去。就邢燕子本人来说，像每个饱经风霜的普通知青一样，始终怀有浓重的知青情结。她晚年数次应邀参加一些知青活动，还为侯隽在窦家桥建的知青村题写了“知青林”三个字，被刻在景石上。

四

与1941年出生，属于50年代“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时期回乡知青的邢燕子不同，文革中我们这些被上山下乡运动裹挟的千万“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期的下乡知青，1966年6月文革开始时还在学校里学习尚未完成学业，我们尽管出生的家庭背景不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属于不同的利益得失群体，却全都丧失了上学、择业和选择居住地的权力和自由，其中绝大多数是不情愿地进了农村这个蓄水池的。虽然我们所走的下乡之路也同样符合了党的需要，但毫无疑问我们成了那个荒唐年代的代价和牺牲品。

实际上我们当年并没有把邢燕子当作学习的榜样，不是不愿，而是不能。因为在城里长大的我们既没有服务于农业的专门知识，也没受过农业技术的实际训练，所以不仅不能以知识为谋生手段，而且下乡后必须首先学会自己做饭，自己管理自己，学会干各种农活儿，还要熟悉当地农民的方言土语、生活习惯、风土民情，学习领会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尽量缩小自己心理的、传统的、社会的、学校的、家庭的等等原有思维定式与农耕文明现实的种种反差，以尽快适应农村陌生艰苦的生活环境。而接受再教育、改造自己的“封资修”思想则是被要求我们的主课，那些为数不少的其父母正在被审查、被关押、被迫害的出身不好带有原罪的知青，更是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看不到前途和希望，以致极度自卑甚至自弃。所有这些，在与邢燕子没有可比性，对她这样的榜样我们只能望尘莫及。

虽然农村这个蓄水池吸纳了大量知青，为农村增添了劳动力，但与此同时也加大了对口粮的需求，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与毛泽东的愿望相反，贫下中农不具备作为再教育者的自觉和自愿、知识和能力。知青接受的是低下的生产力、落后的生产关系以及不可能产生先进思想的农民的再教育。仅靠繁重的体力劳动和简单的生产工具不可能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而僵化的集体经济体制及其方针、政策由于不符合农村实际，更是严重束缚了农业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的各级干部和广大农民尚且放不开手脚，知青就更不可能有大作了。

上山下乡运动没有留下多少物质和精神遗产，如果说它还有什么积极意义，那就是为广大知青提供了对农业、农村和农民切身体验和理性思考的时空，使我们开始怀疑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性，并在后来的改革开放中明白了什么才是中国该走的发展道路。

邢燕子对自己人生是笑话的调侃真实、质朴、经典，耐人寻味。回顾过去，我们每个知青的一生，不也都经历过几次急转弯，也都往往身不由己，也都跟说笑话似的吗？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上山下乡运动落幕距今已经大约40年了，知青的历史已经远去，当年年龄最小的下乡知青也都步入古稀了，该是我们洗尽铅华返璞归真的时候了。

据报道，邢燕子的写字台玻璃板下压着她的座右铭：“廉不诉穷，勤不诉苦、公而忘私、乐而不忧，用人之长、记人之功、容人之过、待人以诚。”这既是她

对自己的鞭策，也是她一生的写照。邢燕子的榜样意义归根结底在于她人性的美好，今天我们应该纪念和学习的，是她真诚、善良、质朴和勤劳的优秀品质。■

【序跋】

顶风冒雪呼唤春天

——《寒空中的小星星》自序与后记

于向真

自序

上小学四年级时爱好上天文，晚上老师带着我们天文小组的几个学生站在大操场上，在强光手电筒引导下辨识星座。最爱的是冬夜星空，在辽远无际的天幕上，冬夜的星辰格外璀璨，猎户座的三颗亮星象征着胜利与光荣，肉眼能观测到的最亮的恒星是天狼星，闪烁出幽蓝的光亮神秘莫测，让十来岁的我们忘掉数九严寒。记不清是哪一年了，很久以前我就冒出个想法：将来写本书，书名叫《冬夜星空》。

时光飞逝，转眼迫近古稀之年，想起迷恋冬夜星空那时，正逢父母远赴欧洲工作，大我两岁的哥哥特别贪玩，周末住校都不肯回家。作为小家长的我负责照料三个妹妹，以及给父母、亲戚写信报平安等琐事，使我从小习惯用笔表达心意，小学、中学作文常被当作范文在班里念，16岁进厂当学徒工，写表扬稿，替厂领导写大会发言稿成了推不掉的额外任务，也因为能写在1985年的公开招聘中脱颖而出进入报社。

在中国少年报当记者、当编辑25年直到退休。白天为小读者办报，晚上编写少儿故事和科普书籍，进报社不久，为摆脱几位同事争当我的入党介绍人而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从此更是忙得不可开交，要完成民主党派会刊的约稿，要完成参政议政的调研项目并撰写两会提案，要给朋友的报纸写副刊专栏文章，直到2006年春下决心“所有付稿酬的约稿一概谢绝”，才腾出精力。此后开始经常性地在网上发博客文章，把生活中所见所闻的人和事以及真情实感，随时记录下来发到网上与读者交流。2016年文革爆发50周年，因为在共识网等网站连续刊发《我亲历的文革十年》系列文章，站到了反思前沿，并结交到一批志同道合的好

友。

我家三代人不约而同都有过主动辞官不做的经历，我爷爷在民国时期当过两任淮北地区的县长，“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参透官场黑暗后，他辞官回到南徐州（现在的宿州市），在北大街买了个三进院办起私塾学堂。我父亲于明是1937年投身抗战的老干部中的另类，1953年春因不肯出任河南省宣传厅厅长，他背个小挎包把自己“下放到国棉一厂当工人”去了；1958年秋，他离开郑州市宣传部部长岗位，和我妈妈一起进京加入英语训练班，学英语后当了新华社驻外记者；1980年在部党委会上讨论魏京生、傅月华能否避开司法程序继续关押一事时，他针对邓指示发表不同意见，说：“文革已经结束了，不能再做回避司法程序的事情了”受到上级警告，很快他辞去司法部宣传厅负责人一职，和老战友庄重一起创办了《法制日报》。2003年12月我父亲病故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这一生很幸福。”其实我知道他也很不容易，战争中负过重伤，历次运动中“夹紧尾巴”如履薄冰，1966年初连续挨批判导致大量尿血，抢救后长期带病工作。

我先生老王和我也是逆风前行，老王手中有权时拒不收礼，多次拒绝当官，单位同事私下碰面，会伸大拇指哥对他说“王哥，你真他妈牛！”60、70年代，我曾努力争取入党，因得罪书记被拒之门外，80年代因不再想入党而加入民主促进会。加入民主党派后，90年代初我第一次面临民进市委领导班子改选，当时各级政权尝试民主投票，我因得票超高，被民进领导决定：“一不能进入领导班子，二不能代表民进出席人大和政协两会”，从而我被边缘化。

我始终童心未泯地具有参政议政的热情，80年代晚期到2015年，为国家进步、民众安全而积极参与社会调研，认真撰写过众多两会提案，比如80年代晚期参与《新闻出版法改革草案》《敦促教育经费提升至国民收入总值4%水平》，90年代单独撰写了《建议国家尽快出台面粉不得添加增白剂的法律》，2015年提交的《遏制拐卖儿童案件持续高发现象，法律应将收买被拐儿童者入罪》等等。因敢言被内定不能出席两会，每次写好提案后我都是交参会者代为提交，90年代获得过几份优秀提案证书。之后有了奖金且数额不断增多，所有获奖证书与奖金都归于代为提交者，我写出的数十份高质量的参政提案与名利绝缘。名利心不算重的我基本无怨无悔，但那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厚颜程度实在令人心寒齿冷。

我也有过与方方类似的经历，2009年清明节，因为我发博文反对某高校政教系副教授带头狂喊毛万岁，受到以乌有之乡领头的疯狂咒骂，一个清华女硕士指名道姓造谣攻击我的论文迅速获得全国优秀论文奖，一时间乌云压城……诅咒谩骂并不可怕，那些污言秽语与我不沾边，可怕的是竟有同道友，她先是通知我博联社如何受我牵连，希望我主动退出不影响博联社的广告收入，受骗的我发了一首小诗《挥别博联》就退出了，心想反正还有几个博客网站可以继续发文章。她不甘心，仍在“清除她（指我）的影响”，有两个朋友气不过告诉我，她正四处游说“让于向真永远没脸回博联社”。我想了想，自己从没做过亏心事，不存在没脸回去的情况，于是立即重回博联社正常发文，把万岁风波就此翻篇。那个女士给我发了一封邮件，道歉加解释，我只回了一句“都过去了，回归常态吧！”那件事在我快60岁时突然发生，让我在被谩骂被冷落被背叛中更趋成熟，我认识到没必要给人划线分派，对立“派别”中也不乏明理之人，“同道”中也有极端分子，重要的是自己坚持原则，拿得起放得下，不惧怕歪风邪气。

就这样一路走来，顶风冒雪逆风前行，我能做的唯有小心呵护着一颗不被污染的童心，同时尽力呼吁同胞们坚守底线，把中华美德中的勤劳、勇敢、智慧和善良传承下去，将独断专行、一手遮天与逆来顺受、任人宰割的大酱缸彻底抛弃，让大家敢想敢说敢做敢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脱离苦海，才能让我们的子孙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本书集结了能收集到的160篇我陆续写的短小文章。第一部分“我亲历的文革十年”，文革是一场人类空前的大劫难，不仅破坏了正常社会的公序良俗，也败坏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十年亲历者日渐老去，我希望更多人留下记录，让子孙后代高度警惕人祸灾难！

第二部分“直言评说”，是我陆续发在网上的时事评论，一家之言为促进国家体制改革、完善管理建言献策，还有我与打假勇士高纯的交往及对他的评价。

第三部分“亲情友谊”，记录了家人、朋友、近邻与我的情谊，后一篇写的是我养过的一只猫，它曾经也是我家的一口。我先后养过两只猫，第二只猫更受我宠爱，也想写它却心痛得难以下笔，两只猫病故、失踪，都曾使我好多日子思念不已。

第四部分“相伴成长”，回忆了我在独生子成长过程中，特别是他踏进职业

生涯初期时我们两代人之间的故事，在许多方面我非常感谢儿子对我的促进与帮助。

第五部分“游历观感”，记叙的是我在国内国外的见闻与感想。

第六部分“缤纷世象”，我在日常生活中针对各种现象有感而发的一些心里话。我长期从事少年儿童新闻工作，与孩子们打交道，替孩子们说话，说孩子们也能懂的话。2006年春，我开始在网上写博客发博文，给自己博客页面起名“老儿童栽培的一棵苹果树”，也是有意识地让自己与功利、奴性划清界限，保持童心未泯的状态。

感恩命运，因父母都是抗战初期从军的老干部，又长期在国外工作享受双工资，自小衣食无忧。我先生和我都是体制内员工，收入稳定，这辈子很少为钱发愁。但有得有失，我一辈子是操心费力的命，从念小学时就开始当小家长，家里的大事小情、迎来送往、写信寄钱都靠我一手操持。难忘小时候每逢年节，家家团圆喜庆之时，我们四个小姐妹相依为命，结成最亲骨肉情，各自成家后，我们常相往来，互励互助。此生令我痛彻心扉的是二妹妹45岁被过劳死猝然夺去生命，大妹妹60岁患胰腺癌病故，成为我永远无法平复的创伤。现在有同心同德的老伴儿，有哥哥嫂嫂、小妹和小妹夫亲情依旧，有懂事能干的儿子儿媳，还有了一个5岁多聪明可爱的孙孙，有志同道合的知心朋友们，他们陪伴鼓励着我勇敢地活下去，满怀信心地迎接春风扑面来，万树梨花开那一天！❀

后 记

2021年10月的一天，几位朋友相约到京郊后沙峪看望住在那里的宋以敏阿姨，何方老辞世后，宋阿姨承续“两头真”精神，笔耕不辍，宋阿姨待我们亲如家人，分送我们何方先生的著作和她的两本新书，大家聊得特别开心。那天看到年过90的宋阿姨仍在写书出书，我受到启发，回家忙了两个多月整理出33万字。

自从国内博客网站被强令关闭后，我停笔数年，直到以前的博客文章陆续发表在电子期刊《记忆》中，我才受到鼓励重新写起文章。

早在2006年《如焉》等那批好书被禁后，我就开始拜读胡发云先生的著作，他的小说我特别爱看。2017年春节，我和几位朋友到台湾旅游，在桃园机场候机时，见到最后一本《迷冬》，立即买下，把一盒凤梨酥分吃后，把那本书装在

纸盒里带回北京。在我的心目中，胡发云不仅是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也是女人能找到的最理想的模范丈夫式的好男人，只要拜读过他的大作，就知道我不是在空口恭维，所以我诚心诚意请发云老师帮我写序。提出请求时，我知道他正住在奥地利郊外，微信中看到有些朋友大老远开车去为他庆生，还住在他家，奥地利的地方行政长官亲笔签名为咱国大作家送来生日贺卡，我误以为发云老师忙过那几天就能在乡下优哉游哉，才冒昧提出帮我写序的请求。没料到他正在赶写长篇小说，我给他忙中添乱，后悔莫及。

胡发云老师迅速为我指出两处与历史不符的笔误，我查询后更正过来，同时生出愧疚，发云老师不仅要挤时间帮我看稿写序，还得兼任纠错。他不愧为文革史大作家，联想起我读过的《迷冬》等书，推测他曾查阅过众多文献资料，花过大心力掌握及核查史实，才能一眼挑出我文中的瑕疵，敬佩之情油然而生，连连感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因为在北美出书，我又请求住在纽约的曾慧燕帮我写序。大忙人的她，正在帮她同在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的文友李嘉音的英文小说《Fire Scar》中文版的《火痕——为华工立碑》写序，每隔一天就要发一篇微信公众号，写作任务超艰巨。慧燕是采访过最多名流政要的华人记者，她的朋友多到难以计数，光是名人好友就数不过来，加上她一向热心，经常面临纷至沓来的朋友往来的各种事宜，所以我告知“不急，少写点”，没想到三天后我就收到她为我写的题为《仰望星空永葆童心》的序，好神速啊！

我喜滋滋看完，转发给我的老同事加好友吴银妮，银妮看后对我说：“一看就知道她很认真地看了每一篇，她写的相当好，对你的评价很准确，写的真就是你……”

一天后慧燕对我说又有些新想法要补充进去，我当然没意见，偏偏赶上虎年春节，大年初一纽约天快亮时我发现她还没睡，提醒她赶快休息，才知道除夕她连天赶夜地努力回复朋友们的贺年祝福，回复的速度怎么也赶不上新收到的速度，当“仍有117个未及回复时，又收到近三百个微信贺年”，我催她赶紧睡觉不必都回，她说“不回复过意不去”。当我再次催她休息时，她说“又收到新的，要针对不同的人回复不同的贺卡”，她这么实心实意，让我既心疼又自愧不如。

我也要感谢好友吴银妮，一直以来我俩无话不说、志同道合，有一天突然想起用她的画做我这本书的封面，就向她要几张以前的儿童画，银妮马上发来几十张让我挑，我选了几张转给出版社，能用好友银妮的画做本书封面，我好开心！

最后说说这本书，6年前有香港出版商愿意为我出书，因他的邮件被重点盯防，结果我被跨国约谈“不许出书”。忍耐6年，今年我将年满70岁，时不我待，于是收集到150多篇小文章。对我而言，6年前出书轻而易举，只需把存在电脑里的文章转给出版社；6年后难度陡然加大，近几年帮助照看小孙孙，电脑长期不用内存已经坏掉，更没料到从2006年春到2018年，自己持续不断用真情实感写出的数百篇博客文章，因多家博客网站被关闭，十多年的心血结晶随之湮灭。仅余的新浪博客网站，除了风花雪月的小文，所有观点鲜明、情真意切的文章统统遭删除屏蔽。我当年认真写好发到博客上广受好评的《夜宿弋阳》《三代不做官》《大车工下岗记》还有多篇鲜活的人物故事，费尽周折也找不回来了，非常可惜。

老儿童新闻工作者于向真用这本以网络日记形式的书，奉献给愿意了解真相的读者们，期待与您真诚交流！📖

2022年2月12日

【序跋】

拒绝谎言，反抗逼迫

——刘海鸥《画说我的一生》序一

何与怀（澳洲）

2020年上半年，我在悉尼写了三万三千字的长篇评论《半壁家园与海鸥南飞——澳华作家刘海鸥和纪实文学写作》。这是我所有文学评论中最长的一篇了，我之所以投入如此大量精力，一个重要原因是刘海鸥在最近几年，连续撰写和出版了多部纪实文学大著，这让澳华文坛众多文友惊喜万分，其中当然包括我。

刘海鸥，笔名凌之，澳大利亚重要的华文作家，三十多年来，撰写和发表了随笔、小说、剧本，以及评论等许多作品，但最出色最大量也最重要的是她的纪实文学作品。我把刘海鸥誉为“澳华文坛纪实文学第一人”。

读者只要浏览一下我的评论，即可证明此言非虚。

例如：《半壁家园：刘辽逸家事百年》。刘海鸥追求历史真相，力图复原“半壁家园”，花费十几年时间，写出了家族的百年历史，同时也反映了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所走的道路。读完这部近三十万字的长篇，我不禁欣喜地感觉到，刘海鸥可以携带她的《半壁家园》进入世界华文家族写作史的殿堂了。

《夕出阳关》是海鸥为她姐姐刘海燕写的五十万字的纪实文学。此书再现了她姐姐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惨痛遭遇。“夕出阳关”这四个字，真是再确切不过，西出阳关的海燕的前途如同夕阳西下，不仅不见故人，而且面临的将是茫茫暗夜——她不属于这个世界。

《海鸥南飞》是“刘海鸥作品第二集”，是早些年出版的《海鸥南飞》的增订本。这些相关作品收编成一部具有连续性的长篇报告文学，记录刘海鸥在澳洲的生活，堪称之为中国中年女性移民澳洲的全景式展示。

此外，刘海鸥还编辑出版了或准备出版《游必有信：澳洲家书》：这是她来澳洲以后从1988年到1994年写给父母的信件，不仅记录她个人的生活，还记录了中国留学生的生活及澳洲社会发生的大小事件；《岁月留痕》是刘海鸥文集的第四集，收入各种各样的故人故事，其中多是回忆，忆父母，忆旧家，忆邻居，忆朋友，忆同学，忆活着的与逝去的人们。《她们的田野》是她家四姐妹合写的纪实文学作品，记录了她们与共和国同步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刘辽逸日记》是海鸥父亲刘辽逸日记的汇编。刘先生是中国著名的翻译家，书中详细记录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文革过程，有着很高的历史价值……

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是她一部图文并茂的《画说我的一生》。

刘海鸥没有学过美术，就是一个业余爱好者，画面可能不完美。此书便是以她的画作配上文字，描述她自1947年1月出生到1988年6月告别北京留学澳洲，这四十年间的亲历亲闻。

钱钟书在《管锥编》中指出：“史家追述真人真事，必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剧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这段话对于纪实文学作家把握“创作”的度，很有指导意义。刘海鸥的纪实文学写作，就完全是追述真人真事，而且不用“设”身局中，本来她就身在其中。《画说我的一生》和刘海鸥其他十部

书一样，主要的内容是关于她的家族、她的家庭、她的生活的种种往事。这些记忆，不仅仅是“她的”，而且是“他们的”，是他们那一代人集体的记忆，非常真实，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某种缩影。这些记忆对刘海鸥来说非常珍贵，她把它们呈现给大家，读者可以从中发现自己生活的轨迹。

这些记忆的珍贵价值显然不单对刘海鸥个人而言。2021年11月1日，专门记述和研究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现象特别是文革历史的《记忆》杂志负责人特别给刘海鸥来信说，《画说我的一生》特别受读者的喜爱，已经成为《记忆》的“镇刊之宝”。为了让这个作品在《记忆》上连载的时间长一些，编者做两次调整，先是把每期刊发的两章，改为一章，后来又将每章（30张图以上的）分成上中下或上下，分成三期或两期刊发，每期发图十二幅。因防火墙增高，网易126、163和新浪等信箱都被屏蔽，很多读者收不到《记忆》，不得不让他们改用国外的或小众的信箱。这位杂志的负责人还说，相对国内的读者而言，国外的读者对刘海鸥这个作品的反应更热烈，更积极。欧美大学法东亚系把它作为当代中国史的辅助教材。

可以从时代更广的角度来认识刘海鸥的纪实文学写作。

从文学史上看，每个时代总会有一种备受追捧的文体。今天，时代风云变幻莫测，国际局势紧张不安，中国国运堪忧，其复杂性有时甚至超乎常识、常理，人们很需要一些启发性的认知参照，例如优秀的纪实文学作品。如许多论者所说，纪实文学的长处在于既可以全景式描写和叙述，波澜壮阔地呈现；也可以局部取样，精雕细刻地创作，在介入现实、描绘人心、表现精神图谱和心灵世界方面拥有小说、诗歌等文体所匮乏的优势。纪实文学是非虚构文体，它的基本特征是真实性、及时性、时代性、知识性和信息性，通常具备文献价值、史志价值、思想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学价值。那些历史纪实，还常常带有解密和揭秘的性质，对于帮助人们认识历史真相、了解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本来面目有所裨益。各种“纪实”文体的要求与特性有所不同，或者说，有所侧重。但总体来说，纪实文学的概念内涵应包括守真求实、融情于理、文史兼容等要点。这是它不同于虚构文学的独特品格，也是其评价标准的理论基础。

以“真实”为其生命的纪实文学写作，对当下中国的情形来说，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所谓“历史”，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史实、史研、史评。加拿大的国际著名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伦为了防止人类走向狂热和灾难，在她撰写的《历史的运用与滥用》（*The Uses and Abuses of History*）一书中，从三个方面总结如何鉴别“有毒历史”。她以非凡的国际视野指出：

“当历史沦为了政治动员的工具时，就是一种被强化了了的想象共同体，所有人都陶醉在这种神话之中无法自拔。”

非常不幸，历史沦为政治动员的工具，正是今天中国的现实。“谁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了未来；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过去。”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他的政治小说《一九八四》道出了独裁的要领，今天的习记新极权统治已把这一要领练成了独门绝活。他们公然提出“历史姓党”，要求历史为加强自己的政权合法性服务。于是，他们大搞历史虚无主义，或掩盖或歪曲，不承认历史真相是客观存在的，实行全民族的遗忘运动。几年前，他们就曾经把十年文革浩劫轻描淡写为“艰辛探索”，近来为习某龙袍加身、个人崇拜更大造舆论准备。例如：为个人独裁和帝王世袭制找历史依据，力图论证中国历史上实行的领导体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领导体制，不是专制制度；用民粹主义抵制西方，提出义和团运动是反帝爱国运动，绝不允许对其妖魔化；胡说明清时期闭关锁国延缓了西方势力“血腥东扩”的步伐，是与时代相适应的外交决策，历史上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以便为习某要实行重新闭关锁国制造舆论……。

知史可以明智。从过去看现在，从现在看将来，人们应该明白中共这些人的套路与伎俩，应该看清他们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为了防止这种“被强化了了的想象共同体”，防止民众都陶醉在这种神话之中无法自拔，防止民族走向狂热和灾难，玛格丽特·麦克米伦在她的书中号召：“一个真正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挑战甚至揭露这种神话，这种神话的幻灭是一个社会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在我看来，不单历史学家，这也是摆在所有真正的知识分子包括纪实文学作家面前的任务。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在1957年10月荣获瑞典文学院颁给诺贝尔文学奖，理由是，“他在著作中以明察而热切的眼光照亮了我们这时代人类良心的种种问题”。加缪在题为《写作的光荣》的获奖词中申明：

既然作家的使命是唤醒尽可能多的人，那么他的艺术就决不与谎言和奴性妥

协，尽管这些东西到处充斥，滋生孤独。无论我们每个人有怎样的弱点，作家职业的高贵永远植根在两种艰难的介入中：拒绝谎言，反抗逼迫。

刘海鸥用她的勇敢坚毅，昭示了在强大的专制势力面前，一个渺小个体的巨大作用——用手中的笔，揭穿谎言，反抗逼迫。📖

2022年9月7日于悉尼

【书讯】

于向真散文集《寒空中的小星星》在美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集结了160篇我陆续写的文章，第一部分“我亲历的文革十年”，文革不仅破坏了正常社会的公序良俗，也败坏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我希望更多人留下记录，让子孙后代高度警惕人祸灾难！第二部分“直言评说”是我陆续发在网上的时事评论，一家之言只为促进国家体制改革、完善管理建言献策。于向真，《中国少年报》编审

第三部分“亲情友谊”记录了家人、朋友、近邻与我的情谊。第四部分“相伴成长”，回忆了我的独生子成长过程中，特别是他踏进职业生涯初期时我们两代人之间的故事。第五部分“游历观感”，记叙的是我在国内国外的见闻与感想。第六部分“缤纷世象”，是我在日常生活中针对各种事情有感而发的一些心里话。



推荐语

于向真的这本集子，内容涵盖了中共建政之后半个多世纪中的社会万象人生百态，基本上都是作者的亲历，亲见，亲闻及引发的所思、所想、所悟。所写的各色人等，大多是亲属友人街坊邻里同学同事前辈师友或一代新人。语言质朴，感情真挚，有实事求是之心，无哗众取宠之意，读来平和亲近。她用那种拉家常的方式，叙述着往昔岁月，其中有许多令人信服的小细节，那些小细节让我们看到了大历史。

历史的真相在细节中，人性的善恶就在文字的情怀里。作为二十世纪那场最疯狂最暴虐的运动参与者，她可以像她那些当年的红卫兵战友一样，继续为这样的事业这样的制度做最后的辩护士与守卫者，心安理得地享受这个制度给予的各种特权……令人欣慰的是，于向真选择了做一个有思想，有道德，有忏悔、自省与悲悯之心的普通人。☞

——当代中国站在思想前沿的先锋作家 胡发云

读完于向真以网络日记形式发表的30万字文集，深深被她笔下鲜活的人物故事、多样化的题材、位卑未敢忘忧国、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以及悲天悯人的情怀吸引。难得的是，她已逾“古稀之年”却童心未泯，字里行间，无论写景抒情，感时伤怀，均跳跃着一颗纯真的赤子之心，荡漾一股浩然正气。

她行事作风低调，不为名不为利，在关注衣食住行等民生问题和新闻出版、

教育及遏制拐卖儿童等社会问题方面做出过力所能及的贡献。1980年代末到2015年，每年她都坚持为“两会”写提案，利用业余时间搞调研、开会听意见、座谈集思广益，然后呕心沥血认真写好提案提交上去，多次被评上优秀提案，辛苦不足为外人道。尽管与名利绝缘，屡遭打击挫折，却无怨无悔。■

——北美资深媒体人 曾慧燕

【述往】

我所参加的文化大革命（二）

杜钧福

九

自从周恩来总理抓我院运动以来，他就定期在国务院小礼堂召集两派代表开会讨论问题。会上两派代表之间自然难免争吵。而周总理每次总讲一些话，由代表回来传达。

一次，周总理谈到，斯大林的党不如列宁的党。列宁的党是生动活泼的。

一提起列宁的党，我们就想起了电影《列宁在十月》。那是那个年月能看的六部电影之一。电影里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这两个人公开写文章反对十月革命且泄露党内机密。列宁不顾他们的反对，领导革命成功。如此说来，季诺维也夫这两个人是不折不扣的真正意义上的反革命。革命成功以后，肯定要把他们清除。然而不。革命成功之后，他们仍是党和国家领导。直到斯大林掌权之后才真正把他们枪毙。所以，我想一个生动活泼的党，就是容许不同意见甚至不同派别的存在，“党内有派”。

又一次，不是在科学院，而是在外语学院，周总理谈到，以前学苏联，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鼓励打小报告。现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纠正这个问题。

在现在的很多回忆录中，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仿佛是这样的形象：他竭力抵制文化大革命，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又不得不说一些违心之言。还有些人说，如果他不讲这些违心之言，他本人也会被打倒，就不能保护大批干部了。我感觉这些说法都过于牵强，不符合事实，特别是后一说法，可以说有损周恩来的形象。

我认为，从他讲的话来看，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有他自己的理解并曾寄托以

希望。至于这理解是否符合发动者的意愿，这希望能否变为现实，那是另一回事。从这一点来说，他和投身文化大革命的广大群众并没什么质的不同。可以说，每个人都有他心中的文化大革命。当然，很多干部也一样，都对文化大革命存在一定程度的认同。否则，就不能解释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绝大部分中央委员何以投票赞成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了。

就拿周总理所说的打小报告问题来说，实在是文革前政治生活中要害之一。这个问题，现在的青年人已很难理解了。在那时，无论何行何业，要想寻求出路，就得入党。但要想入党，只在一般意义上追求进步是不管用的，还必须“靠拢组织”，也就是说，要向组织汇报思想。汇报什么思想呢？光讲自己的思想是不够的，关键是汇报别人的言行，特别是认为有问题的言行。简而言之，就是打小报告。而这条上进的诀窍是在任何政治报告中听不到的，在任何青年修养的小册子里找不到的，党章团章里当然也没有。它不能靠言传，只能靠意会，只能靠“觉悟”。当然，老实人、脑子转得慢的人，可能一辈子觉悟不了。他们老是暗自纳闷：为什么我如此努力，就是入不了党？这就是他们觉悟程度低，不理解党并不是好人的党，而是政治斗争的党。这个政治斗争就是打小报告。而且，如果他们老不觉悟，不但入不了党，还会“脱离组织”。这是非常危险的字眼，听了会冷汗直冒，因为说不定你就是下一次运动的对象。文革以前不少先进分子就这样评价我。我倒不是不想靠拢组织，而是不知道如何靠拢，找不着门。

当然，顺这条道路发展下去，大家觉悟都提高了，也就都变成不拿工资的义务克格勃，党就变成毛泽东所说的法西斯党（按照我的理解）。人们整天鬼鬼祟祟地给别人打小报告，又战战兢兢地怕被别人打小报告。这样活着就够累的，更谈不到什么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了，当然也算不上任何意义的共产主义社会。拿这个问题开刀，实在是抓住了要害。如果搞这样的文化大革命，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当然，事后局势的发展，正如大家所看到的，不但没有制止打小报告的恶习，反而鼓励告密，大搞以言定罪，正如以前历次政治运动所作的那样，而且变本加厉。

周恩来的这些只言片语宛如他思想深处的窗户，透露出他的政治理想。这一理想显然不同于文化革命前的路线，也不同于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思想。

国务院小礼堂的会开了几次后，准备在中关村大操场开大会。大操场东侧的

主席台附近，和动物所之间的墙上开了一个小门。大家知道，周总理要来了。

这个时候，争论的焦点已转移。应地所、化冶所的“反革命事件”已翻过来了。王锡鹏等是否反革命已无争论了。争论的是张劲夫犯的什么样错误，是否应打倒。

9月5日晚上全院在这里开大会，但周总理没有来，可能是本来要来临时有事。先是张劲夫表态。为什么叫表态呢？因为前两天安排他检查，被造反派反掉了。所以现在不检查，光表态，实际跟检查没什么区别，只是简单点。应地所王锡鹏、吴智诚两人发言，然后是地球物理所、自动化所两派共四人发言。代表自动化所造反派的是65级研究生陈小虹。所有造反派代表均说张劲夫表态不诚恳，保守派代表则说很诚恳。

7日晚上再开会。这次周总理终于来了。但开一半他出去接了一次电话，回来说是处理东北的红卫兵截苏联火车事。这次先是大气所两派发言，然后物理所代表发言。代表我所造反派的是研究生常龙存，代表保守派的是复员军人方述彬。后来社会科学部的代表临时要求发言。他只讲了五分钟，讲完喊打倒张劲夫。最后周总理讲话。他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强调三大革命。他对现在情况不满，对这一大会不满，事实上停止了这一大会。他说科学院的情况很复杂，如果罢官能解决问题早就罢官了。他对社会科学部发言人不满意，要社会科学部的人和科大的学生不再参加科学院的运动。

这是社会科学部的人最后一次参加科学院的活动。此后社会科学部与科学院分道扬镳，直至文革后成立社会科学院。科大“革命造反派”也从此撤出我院。

我们造反派对周总理的讲话有些失望，因为他并未明显支持造反派，或者说，未支持打倒张劲夫的意见，也因为他不让社会科学部和科大的人参加我院运动。但我们之中绝大多数人把这归结为自己对总理的意见不理解，当然也难免有些腹诽。

按照周总理意见，改为各所开会。我所于12日开全所大会，还是各室两派发言。我们战斗组由应堃宁代表发言。发言稿是曾传相写的初稿，我修改的。所里开过会，各室又开会，有时双方对立很厉害。还按周总理指示，统计群众意见，多少人主张罢官，多少人主张停职，多少人反对。我想张劲夫错误是严重的，但未必够罢官，就主张停职，虽然我也喊打倒张劲夫。

这时又恢复了业务工作。但很多人无心干工作。我当然也如此。我想，难道文化大革命就这样完了吗？

这时，粟达人给我们战斗组找了一个任务，就是设法给马俭平反。当时粟达人在所文化革命委员会任职。有领导曾想调他去中央文革工作。他不去，后来把所里的事也辞了，还是想搞业务。他说，想首先在中国实现受控热核反应。

自68事件马俭给打成反革命以来，他一直在劳改队里劳改。给68、620事件平反，好像也没马俭的事。有一次在所里斗杜润生还拿他来陪斗。近期以来，他不断向中央申诉，还写了一封血书。材料和血书转到我所文革。文革把这事托付给粟达人。粟达人说，马俭自幼贫苦，冬天赤脚放牛，因冷把脚放在牛粪里，被牛踏伤，至今留有伤痕。他同情马俭的身世和遭遇，想调查一下他的所谓问题。

除68事件外，马俭还有另一些所谓问题。其一就是他曾对人说，中国没有毛主席，革命也能胜利，但要推迟一百到几百年。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毛主席的绝对权威还树得没有后来那么厉害，但他的这句话也够分量了。一开大会，每个人发言，都首先说：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这时大家就跟着各喊三遍万寿无疆或身体健康。

我们一了解，原来马俭的这句话来源于刘少奇的一本书《共产党员在组织上纪律上的修养》。这本书是文革前夜一位干部带到我所，不少人看过。书中有一句话，跟马俭的那句话一样，但说的是列宁。马俭把它移植到毛主席头上了。很多人都认为这句话没什么错，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我当然也这样认为，但不敢说。说过的人后来都为此付出了代价。

十

过了10月1日国庆，局势又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10月1日，林彪在天安门上讲话，提出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问题。继之出版的《红旗》13期社论说，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无法搞斗批改。10月4日我去清华，发现形势大变。10月6日首都三司，即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在工人体育场开会，蒯大富领众人宣誓。周、陈、康、江均出席，并宣读关于给打成反革命的平反，处理“黑材料”的军委《紧急指示》。

清华大学的红卫兵原分两派，即保守派的“清华大学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毛

泽东主义红卫兵”，而9月底新成立的蒯大富的“井冈山红卫兵”人数很少，基本上由原来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组成。社会上普遍认为，他们不是反革命，但也未必是什么左派，倒好像土改或四清中的勇敢分子。

这样一来，对蒯大富刮目相看了，对一切价值要重新评判了。

我们作的第一件事是转抄首长讲话为大字报，贴在所里。我转抄的是中央文革雍文涛在清华的一个讲话。他们也转抄了中央文革其他几个人的讲话。这些讲话还指出，血统论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表现之一。

继而写大字报。我写了一张《而今迈步从头越》，贴在楼前的地上。

我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第一个成果，是把牛鬼蛇神劳改队给反掉了。这个劳改队自运动初期成立以来一直存在，在里面劳改的有马俭和其他一些认为有问题的人。前一段的辩论也未触及这个劳改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后，朱振和贴了一张大字报《造牛鬼蛇神劳改队的反》，我所工厂青年华达海也贴了一张有关的大字报。我贴了一张《比一比》，内容是比较马俭和张劲夫，认为马的错误不比张多，可马还在劳改。可能与我们的的大字报有关，这之后这个劳改队就解散了。马俭的问题也无人提及了。我们为他平反的目的也意想不到容易地达到了。

从这时（66年10月）到67年什么时候，物理所不存在劳改队，无人劳改。67年以后，劳改队重新成立，而且越来越大。到68年清队，马俭问题重新提起，他又进了劳改队。到那时我们自身难保，无法救他。

院所室各级开会，给运动初期打成反革命的人正式平反。化冶所的李亚男因为是地主家庭出身，到这时才彻底平反。化冶所开辩论会。和他们有业务联系的首钢工人发言，说阶级分析没那么简单。“反击”时很多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很积极，难道他们在搞阶级报复吗？我觉得这才是真马列，听着真过瘾。应地所的王锡鹏不但平了反，后来还当上了院“革命造反团”的头头。

9月下旬以后，我所“革命联队”停止活动，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来又重新拉起队伍，并在稍后改称“革命造反大队”，和数学所的“火炬大队”，天文台的“东风大队”，力学所的“红军大队”等一起，组成院“革命造反团”，成为我院造反派主力。

除去院所召开的批判会外，造反派组织和保守派组织都开会批判资产阶级反

动路线。造反派批起来自然理直气壮，保守派就有些理亏，因为他们保张劲夫。所以有时他们就主要批判第二把手裴丽生，而把张劲夫放在次要地位。两方面的批判会总理联络员都参加，但表现出支持造反派的态度，如在造反派的会上讲的话多点。11月18号联络员在造反派的会上有个讲话很明显支持了造反派，引起保守派的不满，要批判这个讲话。

以前主要是造反派和当权派的矛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来，造反派肯定不是反革命了，当权派却岌岌可危，两派群众之间矛盾上升了。造反派中有人认为保守派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我也这样认为，只是不说。还有人提出“反张（劲夫）必反串（联队）”。保守派当然反应强烈。他们说：过去你们被打成反革命，现在你们要把我们打成反革命！我们当然不这样认为。例如攻击我们研究生的保卫科长刘俊才，后来我们从未批判过他，也没给他贴过任何大字报。

国务院小礼堂的会继续开。周总理批评了一个“铅印传单事件”。这是指院的印刷厂光印保守派方面的传单的事件。

不光是批判，还有揭发，抄黑材料。社会上闹得很厉害。北京第一次武斗就是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领导的中央戏剧学院的红卫兵到工作组所在单位军事科学院抄黑材料而打起来的。至于老红卫兵杀四类分子打老师等事是虐杀，不算武斗。武斗是双方面的。

我们院里的抄黑材料没那么激烈。我也没参加抄，也没看到抄的材料，但了解抄的一些内容。黑材料的范围似不太明确。

所里揭发的问题触目惊心。全所一共打了93个反党分子，分一二三类。一类有十来个，有章思俊等。我是二类。还有若干反党小集团。64级研究生似乎是一个。这93名反党分子名单只公布了一部分，主要是68、620先后造反的人。相当多反党分子名字没公布，因为他们和造反没关系，那当然是由于各种政治思想或历史问题。之所以不公布，是因为当时所文革认为其中或者真有问题的人，或者虽没问题，但公布会引起副作用。

这个不完整名单公布后，群情激愤。因为所领导一直说，反击以后，所里开的是辩论会，批判是群众自发的。造反派和很多群众不信此说，但谁也不曾想到会打如此多的反党分子。

而且，大家看到，反党分子并不都是造反的人。也就是说，即使没有一批造反的人，反党分子名单依然会制订，只是没那么多人而已。除去少数很受信任的党员骨干以外，相当多的人都在考虑，名单没公布的那部分会不会有自己的名字？

所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解放的，不仅仅是运动初期造反的人，在有些地方甚至主要的不是这样的人。我的一位中学同学，当时在北大数学系读研究生。他是典型的“白专道路”：出身不好，业务尖子，爱西洋音乐，对当时的政治口号没兴趣，也不善伪装，免不了讲几句有问题的话。他绝对不会造反或参加任何政治活动。然而，就因为“白专”，文革初期被批判和开除团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他被解放了，开除团籍不算数，从此没人管他，直到运动后期又因同样原因挨整。除他以外，当时他们系被重点批判的还有两个人，分别是1956年和1957年北京市中学生数学竞赛的优胜者。在数学竞赛中取胜就是他们唯一的罪行。所以工作组所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反知识的。这难道不是反动路线吗？

到了1967年初，继而揭发出更惊人的内幕：打三类反党分子完全不是所领导的发明。没上级指示，他们绝不能干这事。原来这事和一项从上面“单线联系”布置的专案，代号“西公”有关。所里只有两三人承办并知道此事。在别的一些单位也揭出同样问题。

“西公”是西北公学的简称。西北公学是延安时期专门收容被审查人员的“学校”。“西公”专案的目的是在1966年国庆节前紧急处理一批政治上的异己分子和不可靠的人，以利于文化大革命的开展。这正如红军长征之前处理一批敌军俘虏和阶级敌人，也如战争之前先清理内部。

也许这事真与战争有关。因为在1966年初，备战问题被空前重视。我们年初在农村，接到上级通知，叫大量种植夏天就可收割的早熟作物如豌豆、大麦，仿佛夏天之后就会打仗，等不到秋收一样。我们当时身为工作队员也很纳闷，不知道要和谁打仗。

不管什么原因，“西公”专案的处理有五类：逮捕法办、劳改、“西公”、回乡生产、本单位监督劳动。其中“西公”又称集训，17级以上的（可能包括17级）送五台山，17级以下送上饶。去的地方，看样子类似西北公学，肯定失去

自由，大家称为集中营。上饶那个地方原来确有一个集中营，是国民党关新四军被俘人员的场所，非常有名，有一个电影就叫《上饶集中营》，可能就是同一个地方。所以，“西公”一词既为该专案名称，又为其中的第三种处理办法。作为处理办法，似在劳改和回乡生产之间。

93个反分子和“西公”的关系不很清楚，可能是为“西公”准备的，是“西公”的候补名单。据揭发，“西公”名单最早有三十多人，后压缩到十人，最后定七人。也许这是第一批。其中有早期造反，家庭或本人有问题的人，如马俭、章思俊。也有早期造反，家庭历史都没毛病的人，如政治部几位。也有没怎么造反，也看不出什么问题的人，如我所政治部干部、共产党员、复员军人王成功也在名单内。他本人和别人怎么也想不起来他有什么毛病应受此处分。他况且如此，更不用提知识分子里有各种历史和现行问题的人了。

对于这个大逮捕、大清理、大流放、极端非法的专案，几乎所有群众愤怒到极点。反分子们更感到死里逃生。

现在想来，对照彭德怀在65年就被清理出京，“西公”事件可能是蓄谋已久的。它不仅针对文革初期造反的人。造反的人是撞到枪口上了。

可以设想，如果没有7月底毛泽东回到北京给被打成反革命的人翻案，也没有后来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文化大革命照6月底那样搞下去，“西公”照样执行下去，最后的结果又怎么样呢？我想，那就是全国变成了一个大监狱，不见得比事实上的文化大革命的结局好多少。所以，我们怎么不感谢毛主席？

我当时二十多岁，想起差点就会在上饶那种地方度过残生，不禁不寒而栗，悲愤交加。这件事当然对我影响极大。我不顾一切地投身造反，并长期不想搞业务，只想改革社会。“西公”事件还使我怀疑，文革中或文革前也许还有一些重大问题是老百姓一直不知道的。当然我也相信，任何历史上的罪恶，尽管可隐瞒一时，却不可永远隐瞒。隐瞒近半个世纪的卡廷森林事件，不是最终真相大白了吗？

揭发的材料还表明，在反击期间，那些积极批判我们这些人的人，并未都得到领导的赏识。那些党员、领导认定的积极分子，批判我们是理所当然的，是他们思想觉悟高的表现。但有些以前犯过错误的人，被领导认为思想有问题的人，也表现积极，就被认为别有用心。也就是说，他们当然不能造反，也没资格表现

得和党员、积极分子一样。他们只适合在党员、积极分子后边呐喊几句，才配他们的身份。这些事揭发以后，这些人自然不再追随领导。这种情况非常典型地反映了文化大革命前的政治格局。正像国家领导在群众中或电视里亮相一样，谁站在哪里，彼此距离多少都是很严格的。如果谁不识相站在前头抢了镜头，下次连站在最后排资格也将被取消。

王锡鹏到院里封了保卫部长宫震的办公桌。我所也有人到院里抄材料，发现院保卫部早在运动初期就派人来我所活动。他们装成同情造反的人和这些人交往，然后把这些人的动态直接汇报上去。有的玩笑话也进了院保卫部的档案。当时称这些人为特务。

经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组织分化组合。主要是中间派群众迅速靠向造反派，有的加入造反派组织，有的则另成立战斗队。这后一种情况主要因为看不惯造反派，觉得他们太狂。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被领导认为有问题的人，觉得和造反派一起得到解放，自然从思想上靠近造反派，不管参不参加造反派组织。保守派感到被动。他们时而整风，或把一些人清除出去。到了11月份，保守派组织终于解散。其后，他们大多数变成文化大革命的逍遥派。少数人投身造反派。个别人变得很激进。

十一

坦白而言，我们这些人，对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内容“斗批改”根本不感兴趣。徐鲁溪说，等到了斗批改阶段，我们就出去串联，因为我们不了解所里情况，如何斗批改？其实问题的实质还不在这里。

斗，指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的当权派例如张成美。他如何走资本主义呢？也无非是运动初期就揭发出的那些问题，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投降之类。后来呢，对他的批判就集中到所谓对毛主席的态度上。他的问题无非是说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要简单化，而且是传达上级指示，不是他自己的发明。我们只认为他把群众打成反革命这一点该打倒，和走资派的原来意义完全不同。我们认为在这个意义上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内当权派。在我们当初贴大字报时不明确的问题现在明确了。我们事实上认为，不存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外的斗批改。

批，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我们所这些专家教授，说他们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则可，说反动则说不过去，无论按什么标准。况且，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这批老一些的专家早已不掌权。无论以什么标准衡量，他们至少绝大多数没什么劣迹。所里无论搞得好搞得坏，跟他们没多大关系。那时掌权的是一批从苏联留学回来的30多岁的所谓党员业务骨干，如陈春先、管惟炎、郝柏林、孟宪振。所里把他们集中到学术秘书室里，决定重大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贴大字报的人称前一批人执行资产阶级科研路线，后一批人执行修正主义科研路线。这种批判也没什么意思。何况我们几个和陈春先都是很好的朋友。

改，是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对此，我们更不感兴趣。

概括地说，这斗批改是从左的立场上批判右的倾向。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则是从右的立场对左的倾向的批判。这是方向相反的两种批判。我们和一般群众对前一种批判不感兴趣，对后一种批判感兴趣。拿我们对立面一位复员军人的话来说，我们这些人对批判反动路线积极得很，但从未见我们批判14条和72条。从这一点，他们断定我们绝不是什么真革命。他们的话暗示我们这些人是这些条条的得利者。事实确实如此。他们确实看到了我们的目标和文化大革命的目标之间的分歧。

但我们这些造反派，又被说成极左。这种语言上的混乱的原因在于左右有其坐标。前一个左，指对学术权威、牛鬼蛇神、地富反坏、社会渣滓，对一切出身不好、成分不好、有海外关系，或认为思想有问题的人的左。当然，也包括对当权派的左，但这是因为当权派成为上述形形色色的人的代理人，或当权派犯错误给上述人等造了机会。总之，批判当权派是因为他们对上述人等太好。而造反派的左主要是对当权派的左，造反派批判当权派是因为当权派把造反派和其他人打成反革命，或者说，是因为当权派对上述人等太坏。显然，这两种左是方向相反的。在这些问题上造反派的理论家有进一步的思考。但那是后话。所谓上述人等，实际包括了老百姓这一范畴的主体。简而言之，就是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群众曾很拥护像潘复生、李葆华、刘建勋这些曾对人民好的干部。

我感到，造反派和相当多的群众对斗批改不感兴趣，对以批判《海瑞罢官》为标志的文化大革命原定目标不感兴趣，对批判当权派随便把老百姓打成反革命感兴趣。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符合或迎合（这两词本无区别）这部分老百姓的

愿望。所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能最大地发动群众。也就在这点上，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不同于过去的所有政治运动。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造反派的理论基础。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态度是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分水岭。可以把造反派定义为拥护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政治派别。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实质是反对政治迫害。所说的造反派不打死老虎即其一义。举个例，北大的聂元梓是造陆平的反的，但未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因那时还没有。而且，照我的同学的遭遇来看，在聂元梓得势以后，反动路线照常执行。所以，聂元梓不算造反派，至少不是典型的造反派。

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相联系的是思想解放。

我感到，最早的启蒙是戚本禹在7月底的一个讲话。他在这讲话中最重要的的一句话是反对党支部不是反党。这一句话不知解放了多少人，直到现在还是真理，并未因戚本禹被打倒而作废，因为没再听说有人因反对党支部而被宣布反党。

反对党的基层组织是否反党是反右斗争的重要议题。相当多的人被打成右派就因为他们被批判为对党的领导“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反对党的基层组织。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文革是对反右的反动。

现在，不但党支部不是党的领导的当然代表者，工作组也不一定。正如蒯大富在刘才堂大字报上的批语所说的：“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中，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这里面有的是一种批判意识，一种独立思考意识。

当然，这一思想解放，像历史上所有思想解放一样，都是在既定的舞台上跳舞。这个舞台就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但比起只能听命于党支部来说，毛泽东思想的舞台还是足够大的，容许彼此对立的观点在其上驰骋。因为它又像一个装一切正确思想的筐子。后来不是说，毛本人的一些思想也不是毛泽东思想吗？

一切思想必须统一于至尊，就是毛泽东思想。所谓“大树特树”就是说的这个。这显然是思想上的排他，意识领域的独裁，就是所谓在上层建筑领域的无产阶级专政。然而，至少在文革初期，这个口号无论主观或客观上都不是针对老百姓的。因为老百姓从来没有任何权威。无产阶级所能失去的只是脖子上的一条锁链。

这个口号针对的，是以毛泽东思想代表者、党的领导代表者自居的各级领导或帮闲文人。现在，老百姓人人手持毛主席语录，可以以毛泽东著作为武器，检验一下你们是否真代表了毛泽东思想。在解释、运用毛泽东思想上，人人平等。当然，任何人和毛泽东都不平等，因为毛是神，不是人，与人人平等不悖。这一思想解放是神学王国内部的解放。这样，从运动初期批判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到肯定在毛泽东思想面前人人平等。历史在自我否定中转了一百八十度。又是一条毛毕乌斯带子。

现在一些人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比作法国大革命。我觉得，比作宗教改革可能更恰当。欧洲的宗教改革者标榜圣经有最高的权威，倡导每个信徒都可直接从圣经领悟上帝的启示和真理，是针对天主教会的权威的，并非真想解放老百姓的思想。然而，普通人对圣经的熟悉破除了笼罩在神秘事物上的敬畏和恐惧，从而打破了自由思想的障碍，为思想解放奠定了基础。历史的轨迹往往惊人地相似。

但无论如何，这一时期是群众思想最解放的时期。群众空前关心政治。所谓一家分成两派，争论不休，就是这一时期。一位革命前辈所说的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狂欢节，说的也是这个时期。老百姓不担心有人告密，因为告密已被批判，且无处可告。也不担心被送入劳改队，因劳改队已解散。当然少数有经验的人仍在担心，因为被批判的还会被肯定，被解散的还会重新成立。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主要民间文献正是在这一舆论空前宽松的时期出现。它们是北航的《法西斯党的危险就在眼前》、北师大大的《大大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大大革新社会制度》、伊林·涤西的《致林彪同志的公开信》、遇罗克的《出身论》和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

不是说，造反派被中央文革利用了，或者说，被毛泽东利用了吗？那是一点也不错的。但人们往往忽略的是，在社会上，利用从来都是相互的。造反派也利用了中央文革，利用了毛泽东。不好说谁利用谁更多。按照某种经济学原理，可能是一样多。

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中，我的思想更加动荡，我愈加觉得，我在文化大革命前对一些问题的怀疑是正确的。我竭力想对文化大革命以来发生的一切，对当前的社会作出合乎理性的解释。

追求对社会现象的理性解释对我来说由来已久。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的时候，我刚10岁。当时我们小学校长孙钰作了一个政治报告。当然我想他也是刚听来再转述的，或称传达。我们这位校长岁数较大，是解放前留用的。我总觉得他当时对共产党的一套还未接受，以后也不一定能真正接受，所以传达的并不一定准确。但我还是很认真地听这个报告的。原因大概是当时还很少听报告。以后对那些千篇一律的政治报告就听不进去了，老是打瞌睡。

他讲的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战争的理论，是从政治经济学讲起，一直讲到为什么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我听了这个报告兴奋异常，急切地回家向家人转述。我当时未开始学历史课，但我所看到的高年级的历史书上，总是写着“汉族发祥时代”“汉族繁荣时代”等，对历史只是一种描述，而从未解释历史之所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原因。现在一切都清楚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完全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结果。这里有一种必然性。我尝到了一种闻道的愉悦，仿佛看到了曙光。

在以后的求学日子里，我对马列主义不能解释当前社会非常不满。我觉得，我们所学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像一门科学，而社会主义阶段的政治经济学无科学可言。它就像马克思们所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一样，是一种唯心历史观。

我感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有志于研究当代历史的人提供了一个绝妙的好机会。我观察到，主要是人们在文革前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的政治态度。正如《出身论》中所说的，家庭出身只是起间接的影响。看来家庭出身很重要，那是因为家庭出身往往决定了社会地位，而社会地位决定了政治态度。我所保守组织“工农兵战斗队”标榜出身好，但给他们起草宣言的人是地主家庭出身。复员军人一般是保守派，但在我所工厂是造反派骨干。七机部的人家庭出身都好。在他们那里，造反派主要是知识分子，保守派主要是干部、复员军人。他们两派的名字916和九一五也反映了文化背景的差异。

虽说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就是造知识的反，造反派的知识背景却是特别明显的。我所研究生90%以上是造反派。其中三个进入所级领导班子。别的所也这样。

至于北大的周培源、季羨林、周一良加入了“井冈山”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不管他们自己事后对此事如何解释。而我们的对立面，拿朱振和的话来说，“都是些功课不好的人”。

更加匪夷所思的是造反和专业的关系。在我院，首先起来造反的是那些思辨性强的专业的所，如数学所、天文台、物理所、自动化所。而作为保守派大本营的是化学所、地理所这些作定性研究的专业的所。在一个所的不同研究室之间，也有类似的关系。如我所四室，当时主要是定性研究，保守派就多。这是一种从未出现过的也从没人研究过的新的政治和业务的关系。

当然，在做这种相关分析时要很小心。例如，所学专业是否与家庭出身有关？这也是肯定的。例如后来工宣队进驻北大物理系时，发现理论物理教研室仅有一个半家庭出身好的，即“红五类”。但如果说物理所的人平均比化学所的人家庭出身坏，显然说不过去。

启发思维的还有一些文章。我院的文献不管是保守还是多么激进，均缺乏理论色彩。启发来自院外，即今天所谓异端。我所见第一个异端可能是北大乔兼武的大字报《造三个大反》。造哪三个大反我不记得了，但第三个是建议取消一切办公室。取消办公室如何办公？所以我觉得他有无政府主义的味道。他这大字报以后被批判为取消党的领导，在我所只有工厂的华达海表示赞成。

最有影响的文章是北航“红旗”的《法西斯党的危险就在眼前》。法西斯党的提法来自毛泽东讲话，而我们的体会源于9月份廖承志的一个内部报告。廖的这个报告宣称，不但苏联修了，东欧也修了，朝鲜也差不多。而文革初期的“五十天”则进一步证实了这一危险。

另一篇影响稍小的文章是北师大大的《大大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大大革新社会制度》。他们的提法并不是新的，而是来自伊林·涤西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说要“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革新社会主义制度”。该大字报由于批评林彪而受到攻击批判，也掩盖了它的一些实质内容而未受到关注。我在所内转抄了这张大字报。后来我被整时，这一转抄行为未受正式批判，因为毛泽东说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是反动的，未说大大改善如何。在毛主席表过态的问题上，批判者不敢轻易上纲。无论如何，这张大字报为十年以后的改革开放开了先声，虽然日后人们未必回忆起它。真理的遭遇从来如此。

这些大字报有新意，而且都有造反派的背景，或者按照我们当时的说法，是属于造反派思潮的。上述两篇文章不用说，伊林·涤西的大字报也一样。他批判林彪9月15日讲话压制造反派。就是遇罗克的《出身论》和李一哲的大字报，也是倾向造反派的。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则更为彻底。我从心底拥护这样的观点，特别因为其理论上的自洽。我也心仪湖南省的文革。其发展有些像法国大革命，不断从激进的派别分化出更激进的：从工联到湘江风雷，又到省无联。作为一个世纪以来新思潮的策源地，只有湖南那种地方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然而这些文章但也像那个时代的所有文章一样，空洞，信息量太低。如北师大大字报没说如何改善。我不满意这些文章，但也为这些文献所激励，很想找人讨论这些问题。我找到了和我思想最相通的栗达人、朱振和。他们也对诸如此类的问题感兴趣。我们就以我们三人的名义在所内贴海报，召集一个称为“关心国家大事周末座谈会”的活动。内容为讨论理论问题。时间定在每星期六晚上。

为迎接这个活动，我还写了一张大字报，提出了若干为什么。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大字报的常用文体。

开会那天，人来得很多，有60多，包括各色人等，青年人多，也有中年人，不都是造反派，但保守派几乎没有。我们因人多临时换了会场。我先讲搞这个活动的宗旨。我说，我们对某个领导是否黑帮不感兴趣，我们要讨论的是一些更根本的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保证国家不变修，只打倒某一领导不管用。我没提制度问题，不敢。因为7月份我就说是制度问题。郑少白提醒我57年右派就是这样说的。我说的某一领导指刘少奇。刘的问题，从八月份就开始议论。除文革中的问题外，在群众中流传着他在天津的讲话。我一直认为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关于参加革命的目的的论述很好，但也觉得“吃小亏占大便宜”说得有问题。

大家发言踊跃，会议很晚才结束。以后又开了几次。但效果并不很好。相当多的人，包括很多工人，有政治积极性，但缺乏理论思考的素养。

但我自己凑了一个比较实用的唯象体系。我说是实用的，因为它本身缺乏逻辑上的统一，但考虑到可为环境所接受。其内容主要是比较反右那时和现在阶级斗争形势的差别，可列表如下：

50 年代		60 年代
主要敌人	地富反坏右	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敌人主要进攻方式	正面进攻	和平演变
个人主义表现形式	一切为己	吃小亏占大便宜
斗争方式	反右斗争	文化大革命

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我所谓的思想解放是在非常一般的意义上说的。无论在文革中还是其前后，研究理论问题都是危险行为。危险不仅来自上边。后来，大约 1968 年，我在北大大饭厅附近看了一张大字报揭发批判该校一个反党小集团。其罪状有二。一为反对林副主席。这姑不论。二是企图研究理论。大字报说，所有理论问题都被毛主席解决了，在毛主席著作中都有，再研究肯定是反毛主席的，故为反党。我想这一逻辑与欧洲中世纪教会的逻辑惊人的一致。当时的教会说，除圣经外，所有书籍都没必要存在。因为它们的内容若与圣经不同，则是异端，应予销毁；若内容与圣经同，则读圣经就够了，亦无必要存在。

所以在那个年月研究理论，无异于在哥白尼时代研究天体运行。那个年代成天宣扬的是马列主义是不能讲理的，全要靠灌输，因为工农群众中不能自发产生马列主义。工农群众尚如此，何况我辈乎！所以，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八亿人民谁也逃脱不了被灌输的命运。即使你到了应该是很安静的公园里，震耳欲聋的大喇叭声也会使你深深体会到灌输一词的具体含义。文革后我在美国见到一位台湾同胞能将毛主席语录倒背如流。原来他曾在金门当一年兵，每天听到的都是对岸解放军的高音宣传喇叭广播的毛主席语录声。那些喇叭是我院声学所制造的。

到了 1968 年，我们又恢复了“周末座谈会”。当时的革委会一些领导很支持。他们也经常参加。但这样一来，会议内容就变成讨论一些实际问题，而且像是官办的了，与我们的初衷不符。我们曾想把这个活动交给革委会，我们另外再搞一个，不出通知。但实际上我们也没那样干。时过境迁，谁也没那种积极性了。📷

【述往】

一位省人大代表的自述

——根治西淝水患（下）

张树田

县政府写了“请示”

2007 年 8 月中旬我看到朱家亚给我的一份《凤台县人民政府文件》（复印件）凤政〔2007〕66 号，标题是“关于要求在西淝河入淮口处新建大型排涝站的请示”，并附有“西淝河排涝站项目建议书”。对手中这个姗姗来迟的“请示”，我确实找不到感觉。

对以修建排灌大站为关键的西淝河综合治理方案，我们淮南、阜阳、亳州三市的主要领导人牵头省人大代表们在三年半以前的 2004 年 1 月份就正式向省人大提出来了，接连提了三次都被列为重点，而且省人大领导张春生正在亲自大力度抓督办，主办单位省发改委四个月前就已委托中咨公司编制规划，这些情况难道县政府不知道？没有正式的规划，这么重大的工程项目谁能答复你的“请示”？何况文件标题就是“大型排涝站”，干旱的问题怎么解决？我们多年的要求都是“排灌大站”，272001 年由于大旱西淝河断流的情况你们不知道？而且装机容量这样具体的技术参数应由设计单位确定，不宜在这类文件中提出具体要求，我找专家测算的是 1.5 万 kw 左右，这个文件却帽大三尺提出 1.8 万千瓦的参数。

在这个情况下报送这样的“请示”，只能起到暴露他们糊涂官糊涂做的作用。我思谋斟酌，仍然向朱家亚提出把排涝的“涝”字修改为“灌”字的建议，他口头上接受了，我就没再问了。

西淝河巡察

我在凤台县工作生活了四十多年，对这条纵贯全县南北的内河还真的没有巡察过全线。推进西淝河综合治理也进行了五个年头了，对全线的情况没有系统全面的实地巡察，没有完整的感性认识，是个很重要的缺憾。我把对西淝河下段巡

察一次的要求告诉水利局长宋孝良，他立即做了安排。我和水利局一位年轻干部乘车到了蒋嘴子码头，这时县航运局副局长吕文春已经带几位水手和工作人员等候在那里。他们带来的监督艇也停泊在那里。我们登艇，在吕文春的指挥下起锚发动，汽艇溯流而上迅速向北行驶了。

吕文春对情况很熟悉，把沿线的湖泊、支流、圩堤、泵站、涵闸、桥梁、村庄等一一向我们做了介绍。比较有名的如毛家湖圩、花家湖、杨刘庄圩、朱大圩、小洲湾圩、大洲湾圩、福镇圩、晒网滩圩、许大湖圩、济河口、米吴圩、姬沟圩、港河闸、潘谢铁路桥、杨村大桥……，过去逢防汛调度会只是听乡镇和水利部门干部常提到的一些地点，这次都亲眼见识了。在航行中吕文春有时和熟识的老百姓打招呼，有位妇女问他，“你们弄啥子？可是要扒河啊？”“对，准备扒河！”我猜想，很可能媒体上关于呼吁治理西淝河的报道，这一带群众知晓了。

这天天气很好，碧空如洗，天朗气清，微风拂面，天空偶尔飘几朵棉絮般雪白的云彩。河面波平如镜，河边布满了渔民的拦网和网箱，一行行垂柳、一丛丛茭白翠绿欲滴。轮机过处，不时有大雁、野鸭、白鹭和一些叫不出名称的禽鸟儿从树丛、苇丛中成群飞向碧空。真是人在画中游啊！轮机正在行驶，吕文春说，已经进了利辛地界了，我们回头吧！我们知道闯入人家的“领地”有所不妥，于是就回头，在尚塘乡境内预先安排好的一家饭店午餐后乘水利局自带的汽车回凤台了。

这一次巡察，西淝河如诗如画的美景和丰富的物产，使我愈发感到这方土、这方水、这方人的可爱。如果经过我们的努力不再闹水灾旱灾了岂不更加令人心驰神往？

造访中咨公司

自从省发改委委托中咨公司编制规划以来，国家发改委、中咨公司、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港航设计院等单位不断有人来凤台调研、考察、征求意见。过后得知，仅项目经理姜富华就亲自带人来过两次。其中有些活动我并没有应邀参与。但县水利局要接待、安排、介绍、陪同，新局长宋孝良年初才接任，非常繁忙和劳累。但我见到淮南矿业集团副总经理程功林带领几名处级干部差不多每次都来参与，我又感到县里对这件大事显得着力不够多，热情不够高。

后来得知，中咨公司还承接了与此有联系的另一个项目：《安徽省两淮地区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战略规划》。这两个规划关注内容不一样，但密切关联，必须统筹考虑，而且对矿业集团的利益影响大，他们对这件事密切关注，着力很多是情理之中。但是我们还是应该积极参与密切关注维护地方和人民群众的利益。

有一次我在网上登陆中咨公司网页，看到淮南矿业集团董事长兼党委书记王源率队赴京慰问中咨公司的消息并附有照片。于是，第二天我便到办公室找到牛向阳，告诉他这个情况，同时提议我们凤台县也应该到中咨公司去一趟，对他们表示慰问，并进一步反映对某些规划内容的意见。他欣然答应，表示马上安排。他们做了必要的准备，牛向阳、姚多咏、朱家亚、宋孝良、袁国语(永幸河排灌总站站长)和我从南京禄口机场乘飞机到了北京。当天，我与省发改委陈继先联系，告知我们的行动情况和安排，他显然满意。

第二天上午10点左右，我们一行人到中咨公司见到姜富华，得知牛向阳已经来过了。我和姚多咏等一行到姜富华办公室，对此人此事我最熟悉，无可推托，就开门见山谈起来。大概意思：①建大战已经没有争议，初稿是“排涝大站”我们的意见要改为“排灌大站”，增加“灌”的功能只需投资约1000万元，占大站投资不到5%，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旱”的问题，要以2001年西淝河断流为前鉴。②浚深后的河床标高不超过+14.0，保证西淝河航道的通畅和灌溉提水。③建船闸实现复航不宜拖延，降低煤炭的运输成本，提高淮南煤炭的市场竞争力，缓解矿区环境污染压力，已经很紧迫了。

我心里明白，增加“灌”的功能，省水利厅一直不同意，没听人正面说过理由，根子还是担心增加运行成本和管理难度，水利部门背包袱。但是，咱应该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积极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规划不能留下这个难以弥补的缺憾啊！结果姜富华也没正面回应我们的意见，她也有为难之处。我们住处是国家粮食总局的宾馆，向东不远有水利水电出版社的书店，我进去逛了一两个小时，选购了七八本有关水利、建筑方面的专业书籍。从北京乘飞机回合肥，回家。这一趟，还是很有意义的：向中咨公司表明，凤台县的领导是很重视这件事的，进一步表达了我们的意见，即便不被采纳，也“勿谓言之不预也！”

歉意

2007年的大水给省、市、县的领导们重重地敲了警钟，西淝河综合治理的规划即将出笼，工程要上已是大势所趋，有些原来抵制和消极冷漠的同志明显表示出歉意。

在一次交谈中姚多咏说：“张主任，这件事一直是你推着我干。”我安慰他：“其实你也做了很多工作，你身为县长，工作千头万绪，而我退休了天天主要就想这一件事嘛！”。我想，当初你是被歪嘴和尚所蛊惑，归根结底还是认识水平不高。

在10月29日的督办会上，县交通局长刘佩龙提出了要抓紧解决西淝闸已成危桥的问题，会上张春生明确由省发改委牵头研究解决。隔一天张天培召集省发改委、交通厅、水利厅在凤台会商此事。水利厅计划规划处长王XX也参加了，在会议的空余时间有机会和我晤谈。他说（大意），张主任，建了大站发生了运行费用财政不能跟我们兑现，我们很为难。你是老专家该会理解吧？我明白，他指的还是跟CWX来调研时，他编造“建大站效益不理想”的谎言欺骗我们的事。我连忙说：“理解，理解。”我想：建大战已经是大势所趋，你们也是识时务的，不会再继续拉倒车了，而且即使再拉倒车也不起作用了。况且，你当时这么做，不见得是你个人的本意，很可能是你们水利厅的领导指使的。时过境迁，不会再跟你们计较了。

他和省水利厅系统的好几位处长在不同场合尊称我“老专家”，我回应“你们才是专家”。他们接话：“那你就是专家的老师”。原因是：当时的省委副书记王昭耀和我同年毕业于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他水利系，我机械系。他在任阜阳地委书记时，曾经在省人代会期间到淮南代表团看望我，碰巧我不在，他自称和我是同学又是老乡，于是淮南不少人知道了。他是水利出身，他们以为我也是水利行家呢。但我未置可否，我想，他们这样误解对于我办这件事有好处。

县人大领导同志也表示关心。据说，当办公室主任李保东向他们说起这个项目“被张主任盯来盯去，终于盯成啦！”还询问：“张主任用车可给保证吗？”。其实，对这个事，牛向阳倒还是比较细心，早就向朱家亚和宋孝良交待，“为水利上的事张主任用车，水利局要保证。”

《规划纲要》评审

12月中旬，我接到安徽省工程院通知，12月20日在合肥召开《西淝河下段综合治理规划纲要》和《安徽省两淮地区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战略规划》评审会。按通知要求，我作为特邀代表出席，朱家亚和宋孝良列席。

到会人员约有五十多位，基本上是中咨公司邀请的专家：有水利、交通、地质、矿业、国土资源等方面，有些是前几次对初稿征求意见时见过的。淮南矿业集团的程功林带几位处级干部当然也参加了。会议由陈继先主持。宣布专家组组长是水利厅原厅长郝朝德，我们相熟。

我把会议发的十六开大厚本的两个文件拿回宿舍翻看一下。《规划纲要》正文51页，约有36000字，附有三张彩色专项地图。而《战略规划》正文110页，附有七张彩色专项地图。共约12万字。文件的印制装订都很考究。两项规划基本上是一套人马做的：领导小组是朱黎阳、何平。项目经理是姜富华。专家组及编写人员是王成龙、魏昌林等17人。《战略规划》又增加崔继宪、刘士水两人，共19人。

《规划纲要》有：前言；1.流域概况；2.流域现状及存在问题；3.水系综合治理规划原则和目标；4.采煤沉陷对西淝河下游的影响；5.西淝河流域综合治理规划纲要；6.结论与措施建议等6章。其中对大站的问题，《规划纲要》表述为：“关于新建西淝河排灌大站的问题，建议抓紧研究排灌站的技术经济合理性、合理的建设规模及布局。”因为我以不同方式在不同场合表达了极力主张建“排灌大站”，不同意“排涝大站”的意见，为了减少争议，所以“抓紧研究”作为留下的余地。

在《规划纲要》的前言中有一段文字：“2007年4月12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春生主持召开省十届人大五次会议上代表提出的关于西淝河综合治理问题的建议督办会。会议提出，综合治理西淝河，根治西淝河水患，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点明了这个《规划纲要》发端于省人大代表的建议。我明白，事先这个稿子已经过不知多少专家、领导干部，多少次的审查修改，并且印制成书，很难再提出修改意见了，就是有人提出，只要无碍大局也不可能修改了。

闭会前，郝朝德召集了一次专家组会议，于是评审通过。下一步，应该由省发改委报省政府同意后，再报水利部、交通部和国家发改委审批了。按规定，2008

年一月份省人大代表换届，我彻底退出了。

净身而退，还继续关注规划

工作做到这个程度，应该算是大局确定了。但毕竟还有省政府和水利部、交通部和国家发改委几道关口要过呢。我知道往往是层次越高办事效率越低，越会拖，因为他们随便编个理由，下面不敢怒更不敢言。省人大十一届一次会议于2008年1月下旬举行，我就不是代表了。成了没有任何挂碍的真正的老百姓，实现了“净身而退”。

但是，“位卑未敢忘忧国”，对于我倾注了多年心血的西淝河治理这件大事仍然梦牵魂绕，“拿得起放不下”。怎样才能把已经推上运行轨道的列车，一、不能“掉了道”即以某种形式退出轨道停止运行；二、想办法加快运行。人大虽然换了届，但凤台县、淮南市仍有我的老朋友是新一届代表，可以商量由他们出面推进，其中就有高福平和宗卫东。

我为他们起草了《关于抓住机遇加快进度早日实现西淝河下段通航的议案》，其中列举并高度赞扬了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发改委、省水利厅、省交通厅、省国土资源厅对这项工作的高度重视并取得了重要进展，包括已完成《西淝河下段综合治理规划纲要》，省水利厅编制了以排灌大站为龙头的西淝河下段洼地治理工作方案已报请水利部和国家发改委待审批。……《议案》指出：一、实现通航十分必要；二、实现通航恰逢难得的机遇；三、开通航道的某些障碍和困难是可以研究解决的。

这样写目的是：1. 表明淮南市新一届省人大代表仍有人盯着西淝河综合治理这件事。2. 对他们工作高度评价，让他们知道我们了解当前的进展情况。3. “关门淹”的问题正在解决，下面着重推进通航的问题。对此议案的办理情况和答复，因年代久远已难觅所存文字材料。

陈雷考察西淝河

我已彻底回归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但仍然关心着有关西淝河治理工作的信息。有时见到水利局的熟人会了解到一些情况。2010年3月，看到3月2日凤台县委机关报《凤凰台》头版头条套红刊登通栏标题《国家水利部部长陈雷来凤考

察指导水利工作》，副标题：王三运赵树丛杨振超曹勇姚多咏赵春阳等陪同。我注意到陈雷来凤台只到了西淝闸，考察了西淝河下游洼地治理工程。算起来西淝河下段治理规划报到水利部也该有两年多了，水利部分的审查也该有结果了，水利部长此行目的就在于此。看来，对这个规划批复实施为期不远了。

报道说，陈雷对西淝河等地多年来没有较大规模的系统治理，形成汛期来关门淹干旱无水源，使人民饱受其苦的情况十分关注。他说，我深切地感受到沿淮人民多年来深受洪涝灾害之苦，也深切地感受到他们为治淮建设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和奉献。治淮工作要全面体现以人为本，把实现好沿淮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突出位置。各级政府和水利部门有责任为沿淮人民排忧解难，为他们创造良好的生存和发展条件，使沿淮人民群众真正从洪涝灾害的困扰中解放出来……从水利部长的这段话可以明显感悟到：要对西淝河开展较大规模的系统治理，使沿淮人民真正从洪涝灾害的困扰中解放出来。也就是说，综合治理西淝河水利方面的工程就要启动了！我们西淝河流域一百多万人民的企盼就要实现了！我们七八年时间的呕心沥血奔走呼号就要成功了！

我还注意到，陪同人员中还有省政府副秘书长程中才和副县长 CXX，我想他们肯定不敢像忽悠我们一样再忽悠水利部长和省长了。水利厅王 XX 处长也不会再强调建大站“效益不理想”了。哈哈，他们的冷漠、抵制、忽悠都终究未能挡住历史车轮的前进！

水利部下达批复

工程开工后，我到工地看望施工现场管理工作几位同志，了解到有关的重要进展情况。他们给我看了有关这个工程的文件，从此了解到一些过程。

2014 年 6 月，国家发改委批复了《安徽省淮河流域西淝河等沿淮洼地治理应急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以下简称《可研报告》）。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批复意见，并结合近年来项目区工程变化情况，安徽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于 2014 年 10 月编制完成了《安徽省淮河流域西淝河等沿淮洼地治理应急工程初步设计报告》（以下简称《初设报告》），安徽省水利厅以皖水基〔2014〕89 号文将《初设报告》报送水利部。

2014 年 10 月 9-11 日，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在北京召开会议，对

《初设报告》进行了审查。参加会议的有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水利厅，阜阳市水务局、颍东区水务局、阜南县水务局、颍上县水务局，亳州市水务局，淮南市水利局、凤台县水利局，蚌埠市水利局、怀远县水利局，以及安徽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等单位的领导和代表。会议听取了设计单位关于《初设报告》的主要内容的汇报，分组进行了讨论。

会后，设计单位根据会议讨论意见对《初设报告》进行了修改完善，于2015年5月提出修改后的《初设报告》文件有《水利部关于安徽省淮河流域西淝河等沿淮洼地治理应急工程初步设计报告的批复》及附件《审查报告》。并附有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向水利部报送的《水规总院关于安徽省淮河流域西淝河等沿淮洼地治理应急工程初步设计报告审查意见的报告》，报告称：（1）基本同意新建西淝河排涝站，设计排涝流量为180立方米每秒，排涝闸设计流量为412立方米每秒。（2）西淝河排涝站作为引江济淮工程中江水北送西淝河线路提水泵站，设计引水规模为85立方米每秒。为大（2）型工程，工程等别为二等。35能排能灌，是从一开始就提出来的要求，但规划中中咨公司一直坚持单一排涝功能，我们多次与之交涉都没结果，我认为这是水利厅为了少找麻烦少背包袱而坚持的意见。这下好了，借了引江济淮和江水北送的光，实现了能排能灌的初衷，完满实现了旱涝保收的目标。

在《初步设计报告审查意见》中还明确：基本同意《初设报告》提出的工程管理体制及管理机构设置方案。本次治理新建的西淝河排涝站、高唐湖排涝站分别成立管理单位，隶属淮南市水利局，新增管理人员分别为50人和30人；其他除险加固工程建成后按现有体制进行管理，不新增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哈哈，那几位官员以“管”作盾牌，抵制这个工程，全是忽悠外行的。能建起站来还用愁管吗？有什么深不可及的奥妙？水落石出了！

在《工程概况》中做了进一步说明：泵站布置6台2900ZLQ-100型水泵，单机功率2400KW，总功率14400KW，主变压器2台，单台容量为10000KVA，总容量为20000KVA。凤台县西淝河洼地治理工程总投资3.2亿元。其中包括拆除重建老西淝闸，在老西淝闸处重建公路桥，新建王嘴东湾排涝站、刘王排涝站，更新改造许大湖排涝站、米吴排涝站、朱大圩进水涵、刘楼防洪闸、徐圩涵、济

河引水(自排)闸等。

百年期盼梦想成真，成就千里淮河第一大站

2015年11月26日，西淝河泵站正式开工建设。建设单位：凤台县西淝河洼地治理应急工程建设管理处。设计单位：安徽省水利水电勘察设计院。施工单位：安徽水电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理单位：安徽阜阳市聚星水利工程建设监理中心。合同工期：36个月。

据水利部门介绍，西淝河泵站是千里淮河第一大站，是安徽省境内的第二大站，稍次于坐落在无为县的长江凤凰颈排涝站。凤凰颈泵站装机容量为1.48万kw，比西淝河泵站的1.44万kw大2.78%。但泵站建设规模大于凤凰颈，机房高度和造型、内外装修、色彩装饰优于凤凰颈泵站，而且凤颍公路跨越西淝河修筑了独立的西淝河大桥，不再采用以闸带桥的设计，更加合理，也更加壮观。凤凰颈大站竣工于1990年，而西淝河泵站将于2018年底竣工，晚了28年。可以想象，这28年换了一个时代，换了一辈新人。无论是人的思想观念，还是科学技术水平，工程管理水平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工程的设计理念、设计标准、审定程序、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的确定乃至现场管理水平都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了。

开工后我多次到施工现场，据在现场工作的高俊健、郭翔宇同志介绍，这是千里淮河最大泵站，省、市乃至水利部都很重视，经常有领导和专家来检查指导工作。而且工程涉及的各方面都很重视，包括设计、施工、监理都把干好这个工程作为本单位的一张名片，作为参与者个人历史上一个亮点！这个工程是这个地区一百多万老百姓的幸运，将成为这一方一道亮丽的风景，显现其景观价值。

我明白：

一、做这点事完全是应该的。这是因为：1. 我从山东黄河边贫寒农家普通青年，成长为具有一些文化知识的国家干部，浑身充盈着父母的养育之恩、党和国家的培育之恩，组织和人民群众对我信任之恩。做点事只是回报于万一。2. 机会难得。当时全省的省人大代表只占全省总人口的十万分之一，而且我是打了“擦边球”幸运列为候选人而当选。能有一方百姓说话办事的机会就更显得难得了。而且对治理西淝河这件事能在宏观上有了解认识、微观上有经历体会的代表就更

少了。3. 我已经六十岁，当代表就这一届了，为老百姓说话办点像样的事的机会不可能再有了。如果错失良机，会愧悔终生。

二、做好这件事是众多的机关、部门、单位、专家、领导干部工作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从中咨公司、国家发改委、水规总院，到省人大、省政府，到省发改委、省水利厅、交通厅、国土资源厅，到省工程院、省水利水电勘察设计院、港航设计院，以及淮南市和凤台县的党委、人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都为此做了工作。使我不会忘记的是县水利局长宋孝良，副局长黄中友、张成功都为此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我也不会忘记县人大办公室的李克彪、陈登凯、刘庆久等为我打印文件、开车接送都尽心尽力热情周到。

三、西淝河流域的一百二十多万人民一定要记住省人大黄岳忠、张春生两位领导。黄岳忠主持省人大的日常工作，我们提了三次议案都被列为全省的重点建议；张春生领衔抓督办，态度坚定旗帜鲜明雷厉风行抓落实扭住不放，直到省发改委委托中咨公司把规划做出来报到省政府，又获水利部和国家发改委批准。项目落地了，他们届满卸任。他们俩如果像 CWX 那样，甘当一些不作为的官员的尾巴，这个工程就没影儿了！一将不为，累死千军无奈何！

四、至于推进过程中从省到县一些领导干部对这件好事那样冷漠、消极甚至抵制，甚至忽悠欺骗我们的表现，使我对我们的体制、机制、官员队伍的素质有了更进一步的体会。一些干部的不良表现，当时感到意外、气愤和无奈。但联系当时的党风、政风、社风，选任干部机制，也属正常。他们大多数人胸中没全局，宏观没概念，微观没体验，对老百姓感情淡薄，缺乏责任心和使命感，这不必大惊小怪，何况程度不同地表现了有所悔悟。所幸，和他们斗智、斗勇、斗毅力，没动摇、没放弃、没松劲。

五、不忘初心。这句话是习近平在讲话中启发党员干部不忘党的宗旨和党员的理想信念引用的佛家语：“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其实我从小并没有什么雄心壮志。上小学时梦想当个小学教师，上中学时梦想当个中学教师或技术工人，待上了大学认为能当个合格的工程师就不错了。至于时代潮流把我裹挟至此，是身不由己。但是没忘向父母、国家、老百姓感恩。怎么感恩？就是起码要把本职的事做好，还要尽力多为国家为老百姓做好事，办实事，决不能“占上茅坑不拉屎”！在多年的工作中，我参加很多次防汛抗洪总结大会，表彰抗洪抢险先进单

位、集体和个人。当时我想：被表彰的这些人固然精神可嘉，但是一个地方几十年来水灾连连，干部受累群众受苦受穷，为政一方的官员们是否应该考虑根治水患，不再需要这些先进模范吃大苦、耐大劳、冒大险了？就像战争年代咱争取了和平，就不需再出革命烈士、战斗英雄、支前模范了？

我曾在一次防汛会议上讲了这个意思，自然无人呼应，因为这个题目太大、太遥远了，在座的都是县、乡干部，没人有这个职权责任考虑谋划这个问题。只是好几年以后有次闲谈，有位干部说记得我曾说过这个意思的话。根治西淝河水患，这算不算我的初心？所幸，我没有忘记，我尽力了。

六、西淝河缘何迟迟未得系统治理？在参加规划纲要评审时听水利厅一位处长在分组会上说，西淝河下段，是淮河重要支流中个别一直没得到系统治理的。我想其原因主要是：1. 本干不长，虽跨三个市，但其本干距离阜阳、亳州、淮南三市党政机关驻地距离较远，对三个市政治经济都没有构成根本威胁。近几年流域内虽建了不少大矿，但大矿的防洪措施比较可靠。2. 对三个市的利害关系大体均势，没有哪个市愿当出头鸟，首先提出启动这件事。更不可能出现三个市联名向省政府报告要求省里牵头抓治理的行动，这可是在政治上犯忌讳的事！3. 市县领导一茬茬重复着雷同的路线图：汛前，抓动员准备备足物资器材，排查险工险段、排除隐患准备防大汛抗大灾。汛中，组织巡查防守，层层抓检查督促。领导亲临前线指挥抗洪抢险，甚至冲锋陷阵。汛后，庆祝胜利、总结表彰、堵口复堤、救灾扶贫。年复一年，循环往复，市县领导们为官一任不出事就是成绩，不影响升迁提拔。难怪有一位当过多年乡镇党政主要领导人的朋友，述说他所经历的趣事：他曾经和当时的县水利局长谈起西淝河防汛的事，问：可不可以建个大站抽排涝水？当即受到这位局长的嘲笑：“你真天真，照你这么说，淮河滩上还能栽稻哩！”朋友没再言语。

行文至此，我不禁联想：我们这次不仅提出了建大站，而且提出修船闸和疏浚河道，岂不更应该遭遇嘲笑？对于运作过程中多位官员的冷漠、抵触、甚至欺骗、忽悠就更不值得大惊小怪了。毕竟，他们没挡住历史车轮前进的步伐！

当然我也没有停止对这段经历的回忆和思考。原来这是国务院确定的大工程本书完稿前，我参加陪同市人大退休老领导们参观了大站，见到工作人员送的《凤台县西淝河洼地治理应急工程简介》彩页这样介绍：西淝河泵站是国务院第

48次常务会议确定的全国172项重大水利项目中的骨干工程之一，也是淮河流域西淝河等沿淮洼地治理应急工程中最大的单项工程，作为目前全省在建工程规模最大的泵站工程，西淝河泵站建成后将是淮河流域最大的排灌工程。西淝河泵站建成后，可使阜阳、亳州、淮南等三市五个县(区)170万亩耕地、126万人免受洪涝灾害影响，确保了淮南矿业集团、中煤集团等七个煤电基地防洪安全，使我市历年防汛任务最重的西淝河流域“关门淹”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极大地缓解西淝河沿线生产圩堤防汛压力。

同时，西淝河泵站作为省政府一号工程——引江济淮工程调水路线中江水北送的龙头泵站，还担负向皖北及河南省周口、商丘地区引调水功能。西淝河路线定位为清水廊道，年调水总量11亿立方米，调水量占淮水北调总量一半，且全部作为饮用水，工程建成后将极大地缓解皖北及河南南部极度缺水地区近300万人饮用水的压力。西淝河泵站是我省集防洪除涝和生态调水为一体的跨流域、跨地区水资源配置的战略工程。■

【资料】

北京大学社教运动资料选登（3）

陆平同志9月4日在北大党员干部

整风学习会上的讲话

这次会议从7月29日开始，已经一个月零六天了。现在回顾一下这一段会议，对下一段怎么做，做个安排。

一、这一段会议有很大收获，主要是：

1. 增强了党性，党内的原则空气比以前浓厚了。一个多月来的实践证明这次整风学习会中心放在解决增强党性的问题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许多同志认为：这次校系两级领导骨干认真地检查党性不纯的问题，在北大历史上是空前的，为北大全党增强党性、加强团结作出了良好的开端。不少同志谈到，这些年来，很少检查自己，对自己一分为二，看到了自己身上资产阶级思想还不少，个人主义、形而上学还不少。许多同志在丢掉了思想上的包袱以后，感到心情舒畅，从此可

以轻装前进了。有些同志说，现在进一步懂得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大家希望把这种批评精神坚持下去。

同志们经过自我检查，又听了几个常委的发言，对个人主义的危害性加深了认识，深感有了个人主义，遇到严峻的考验，就容易在政治上犯错误，给党带来损失，普遍提高了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大家对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也看得比较清楚了；看到资产阶级思想在北大党内的影响相当大，相当严重，党的战斗力不强。张磐石同志所以能在北大搞浑一缸水，确实是因为北大党内本来就有淤泥，党内存在着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在有些时候，有些地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简直是合法存在，受不到抵制。党内流行一些错误的说法，如：我不积极工作是反抗你们的资产阶级路线，为个人主义合法存在制造借口。大家认识到今后必须在党内经常开展反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各种不良倾向的思想斗争，不断增强党性。首先是校、系两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只有这样，才能把北大的党逐步建设成为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得起大风大浪的有战斗力的党，这样办好北大才有可靠的保证。

2. 提高了对张磐石同志的错误及其危害性的认识。许多同志反映，民族饭店会议以后，对张磐石同志对抗二十三条、不执行中央书记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指示的错误有了认识；但是，对张磐石同志在北大前一段社教运动中采取了一套违反党内生活原则的恶劣作法及其危害性认识很差。会议开始时，许立群同志，邓拓同志说，张磐石同志不仅起了搅浑水的作用，他还在水里放了毒，把资产阶级的作风带到北大党内来，不仅伤害了被批判的同志，也伤害了跟他走的同志，给北大党的团结造成了很大的危害。不少同志还认识不足，体会不深。通过这次整风学习，大家的认识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进一步和张磐石同志的错误指导思想划清了界限，并从张磐石同志所犯的错误中，得到了许多经验教训。在北大党内本来就存在着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不清的情况，这次张磐石同志利用、扩大和加深了矛盾，搞得更加不清，更为混乱了，这次会议中有不少问题已基本上或初步得到了澄清。还有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澄清。

3. 对学校过去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初步的清理。一部分校、系主要负责人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初步检查，听取了同志们的批评。有些系还对系里工作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有所解决，有所前进。但是总的说

来这方面做得是不够的。在清理张磐石同志的错误造成的影响以后，我们一定要严肃认真地继续检查我们的工作，解决北大本身存在的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是不能办好北大的。

4. 在学习和运用主席关于开展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继承党内斗争的优良传统，恢复正常的党内生活方面前进了一大步。

过去北大党内生活中有许多不正常的现象。平时，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开展，原则空气淡薄，甚至当面不说，背后乱说，自由主义严重。一到运动中又往往发生过火斗争。这次运动中，由于张磐石同志错误指导思想更造成了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现象，大家都感到这种日子是过不下去了的。

这次会议贯彻了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绝大多数同志互相交了心，开展了同志式的批评。总的来说，大家努力学习摆事实，讲道理，对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从而体现了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精神。大多数人觉得虽然思想斗争是紧张的，有的同志还经过了痛苦的思想斗争过程，但是在提高思想觉悟，放下包袱以后，精神是轻松、愉快的。大家都受到了一次正确进行党内思想斗争的深刻教育，都希望回校以后，要把这次会议的精神贯彻下去，在全党逐步恢复正常的党内生活。

5. 在增强党性、提高觉悟的基础上，团结增强了。原来彼此不讲话的，讲话了；面和心不和的，解开了一些疙瘩，隔阂减少了。总的看来，大多数同志思想比过去接近了。有的系领导骨干在运动中隔阂很大，现在团结有很大改进。

领导小组认为会议也是有缺点的，主要的缺点是这次会议分为二十二个组，各组的问题都不少，领导上抓不过来，对大家具体帮助不够。常委忙于自我检查，顾不上对各系进行具体帮助。

二、下一步怎么做？

经过一个多月的整风学习，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收获。但是，各单位的情况不同，存在的问题有多有少，整风学习的进度也是不平衡的。有一些系问题解决得比较好；有一些系主要问题解决得差不多了，还有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有一些系问题解决还不够好，但也为今后解决问题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少数系原来问题多，虽然有所前进，但离根本问题还相当远。常委的问题也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

一个多月的会议，要想彻底解决所有的问题是不可能的。现在看来，要解决常委和少数问题多的系的问题还需要一段时间，而大多数系的问题已经解决得差不多了，学校又已开学，各方面工作很多。因此，在这一段时间内，其他系可以先回学校。具体安排是：

1. 常委、哲学系、技术物理系、经济系留下继续整风，直到把问题解决为止。问题解决以后，再请全体参加整风学习会的同志回来，向大家做报告。

2、其他系可以在下周内陆续回校。如果对常委的意见没有提完，还可以提，本系有哪些迫切需要又可能解决的问题，可以用几天时间进一步解决一下。其他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回校以后可以在总支委员会集体领导之下，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解决。

三、回校后怎么办？

回校以后，要根据彭真同志6月29日报告和这次会议的精神，对全体党员干部进行教育，目的是帮助他们提高认识，在他们中间清除张磐石同志错误指导思想的影响，使他们正确接受前一段社教运动的经验教训，增强党性，加强团结。对于没有参加这次整风学习会的同志，不要求他们每个人都做自我检查。具体做法是：

1. 向他们传达彭真同志6月29日报告，并组织他们认真学习。

2. 组织他们学习这次整风学习会印发的开幕词和学习文件。

3. 各系分别传达这次会议的精神，传达许立群同志、邓拓同志的报告和讲话。还有常委同志在大会上的自我检查。

4. 在学习过程中，各系党总支正副书记、正副系主任要选择适当的时机在全系教职员党员大会上作自我检查，并召开小会，听取他们的意见。（不在大会上进行批评）

学校里的同志从讨论民族饭店会议四个录音报告以后，很长时间未参加运动，思想上与我们距离很大。因此需要先学习一段时间，以便提高大家的认识，但系的领导干部做自我检查的时间，也不宜拖得太晚，以免发生学习不能深入甚至争吵起来的情况。大家不要把检查理解为消极的还账。领导干部采取对党、对同志负责的态度，对过去的工作和运动中的问题认真加以清理，分清正确与错误，一定不会对同志们有启发、有帮助。

5. 在组织生活会中，讨论从前一段社教运动中应该吸取的经验教训。领导上不要求每个党员做自我检查，但党员在组织生活中，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应当欢迎。

对党员进行教育，是一项很重要而又相当艰巨的任务，需要进行耐心的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各系总支要摸清思想情况，做好准备。最重要的是领导干部应当站得高。同志们思想不通，只能说服教育，不能采取简单急躁的办法，更不能搞过火斗争。刚才许立群同志讲这次会议开的是不是好，还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到会的同志党性究竟增强了多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究竟提高了多少？能不能按照党内斗争的正确原则，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来解决党内的思想分歧？回校以后能不能搞好党员的教育就是一次考验。大家一定要站在党的立场上按党的原则办事。前一段运动中人为地造成的积极分子和被斗的人之间的界限，不要再保存下去。大家都是共产党员，都要按毛主席思想办事。现在，有些人怕挨整。整风是以毛泽东思想整资产阶级思想，以无产阶级党性整资产阶级党性。无论是谁，有资产阶级思想，首先自己就要起来整自己，也要欢迎别人帮助整。绝不是以积极分子为一方，被斗的人为另一方，你整我，我整你。界限应该划在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之间。这次整风，我第一个在大会上检查，第一个整的是我，是整我的资产阶级思想，我很愉快。我犯了这么多的错误，给党造成这么大损失，还不该整吗？我首先要自我革命，同时欢迎大家帮助我整掉资产阶级思想。如果不整，病毒保留在身上，迟早总会犯错误。过去如果我们多整一整资产阶级思想，可能这次会少犯错误。希望参加这次整风学习会的同志回去以后，很好地帮助在校同志，同时也接受他们的帮助。常委还要在这里继续整风，这件工作主要由各系总支委员会负责领导，我们相信同志们会把这件工作做好。

关于参加农村四清的问题：因为校系领导干部的整风学习会还只是暂时告一段落，以后还要复会，因为各系还要对党员进行教育，决定除抽调少数骨干带队下去以外，大部分校系领导干部都留下，总支书记、系主任都不要走，等整风结束后再下乡。一般党员可以按原定计划去参加农村四清。❏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老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成为本刊会员，遵守本刊规定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宗旨，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刊训。遵奉众生平等，百家争鸣之精神，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本刊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方惜辰，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林 洛，信箱：lerevel860@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